

目 录

【高研院要闻】

- 高研院聘任四位兼职研究员 / 1
- 南京大学—哥廷根大学精英德语班开学典礼 / 1
- “中日视野下的东亚知识体系构建”国际学术研讨会 / 1
- 德国哥廷根大学 Heinrich Detering 教授来访 / 1
- 美国纽约大学 Richard Schechner 教授来访 / 2
- 德国哥廷根大学副校长 Hiltraud Casper-Hehne 教授来访 / 2
- “汉学主义：理论探索”学术研讨会 / 3
- 德国柏林自由大学 Erika Fischer-Lichte 教授来访 / 3
- 高研院特聘教授顾明栋来院工作 / 3
- 美国纽约市立大学 Richard Wolin 教授来访 / 3
- 德国哥廷根大学 Frank Kelleter 教授来访 / 3
- 徐兴无教授赴台湾大学高研院短期访学 / 4
- 美国布朗大学副校长 Matthew Gutmann 教授来访 / 4
- 我校学者参加第五届“两岸三地人文社会科学论坛” / 5
-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黄承元教授来访 / 5
-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周启荣教授来访 / 5
- 工作坊“如何撰写欧美大学文科博士、博士后奖学金的申请报告” / 5
- 挪威奥斯陆大学 Rune Svarverud 教授演讲 / 5
- 陈蕴茜教授受聘为高研院院长助理 / 6
- 以色列希伯来大学高等研究院院长 Eliezer Rabinovici 教授来访 / 6
- 何成洲教授当选“国际易卜生委员会”主席 / 7
- 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尹晓煌教授演讲 / 7

李恭忠副教授赴台湾大学高研院短期访学 / 7

高研院名誉院长张连珍女士演讲 / 7

学术沙龙“概念与记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动向” / 8

【名家讲坛】

作为先锋艺术的 9·11? [美国]理查德·谢克纳 / 9

中西比较中的求同趋势与汉学主义之根源 曹顺庆 / 13

汉学主义与东方主义 赵稀方 / 18

“世界批评理论”的可能 赵毅衡 / 21

“求真之学”抑或“权力话语”? 叶隽 / 26

【学术前沿】

如何让发展更加包容起来? 高传胜 / 30

江湖：中国传统社会与文化的另类解读 李恭忠 / 32

后殖民主义与科学 蔡仲 / 34

从协调发展到环境优先 吴卫星 / 36

中韩企业海外扩张战略动机比较研究 戴万稳 / 38

【会议综述】

“汉学主义：理论探索”学术研讨会综述 / 42

【跨学科研究】

南京大学—哥廷根大学德语精英班项目 / 47

【出版讯息】

《文化研究》第十辑 / 50

【大事记】

高研院 2010—2011 学年第一学期大事记 / 52

Table of Contents

(IAS Headline)

IAS appointed four part-time research scholars	1
Nanjing University/ Georg-August University of Goettingen English German Class opening ceremony	1
international academic seminar “Chinese and Japanese Perspectives of Eastern Asia Intellectual Structure”	1
German Georg-August University of Goettingen’s professor Heinrich Detering came to visit IAS	1
New York University professor Richard Schechner came to visit IAS	2
Georg-August University of Goettingen vice-president, professor Hiltraud Casper-Hehne visited IAS	2
“Explore the Theory of Sinology” seminar	3
German Free University of Berlin’s professor Erika Fischer-Lichte visited IAS	3
IAS distinguished research professor Gu Mingdong came to work	3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ofessor Richard Wolin visited IAS	3
Georg-August University of Goettingen professor Frank Kelleter came for a visit	3
professor Xu Xingwu went to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s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as a visiting scholar	4

Brown University's vice-president professor Mathew Gutmann was invited to IAS	4
Nanjing University scholars attended the fifth "China and Taiwa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Forum"	5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s professor Huang Chengyuan visited IAS	5
University of Illinois's professor Zhou Qirong visited IAS	5
workshop on how to write doctoral and post-doctoral humanities study scholarship applications for western university	5
Norway's University of Oslo's professor Rune Svarverud gave a presentation	5
professor Chen Yunqian hired as the assistant of the Dean of IAS	6
Hebrew University of Jerusalem's dean of the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professor Eliezer Rabinovici visited IAS	6
Professor He Chengzhou was elected presid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Ibsen Committee	7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ofessor Yin Xiaohuang gave a presentation	7
associate professor Li Gongzhong went to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s Institute of Advanced Studies for an academic visit	7
IAS emeritus president Mrs. Zhang Lianzhen lectured	7
academic salon titled "Concept and Memory: New trends of Chines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8

(Master Forum)

9/11 As Avant-garde Art? (American) Richard Schechner	9
Comparison of eastern and western tendency to identify and the origin of sinologism Cao Shunqing	13
sinologism and orientalism Zhao Xifang	18
The possibility of a world critical theory Zhao Yiheng	21

pursuit of truth or power discourse? Ye Juan 26

(Academic Frontline)

How to Make Development More Tolerable? Gao Chuansheng
..... 30

Jiang Hu; The Alternative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CultureLi
Gongzhong 32

Post-colonialism and Science Cai Zhong 34

From Coordination Development to Environmental PriorityWu Weix-
ing 36

comparison of Chinese Korean enterprises expansion, strategy, and
motive research Dai Wanwen 38

(Meeting summarization)

“Explore the Theory of Sinology” seminar 42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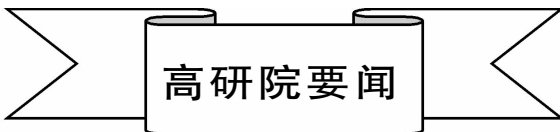
Nanjing University/ Georg-August University of Goettingen English
German Class 47

(Publishing Message)

〈culture research〉 tenth volume (spatial research collection)
..... 50

(Major Events)

IAS 2010—2011 Fall semester major events 55



高研院聘任四位兼职研究员

2010年9月1日,高研院举行兼职研究员聘任仪式,第五期驻院学者陈蕴茜教授、李里峰教授、黄荭副教授、胡恒副教授受聘为高研院兼职研究员。至此,高研院聘任的兼职研究员已有20人。

南京大学—哥廷根大学精英德语班开学典礼

2010年9月17日下午,首届“南京大学—哥廷根大学精英德语班”在高研院报告厅举行开学典礼。该班面向南大本科生择优选拔参加,学习德语课程,学时2年,共计1020小时。该班由专任德语外籍教师任教,中德双方共同管理。

“中日视野下的东亚知识体系构建”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0年9月23日至25日,由南京大学、日本人间文化研究机构共同主办,高研院承办的“中日视野下的东亚知识体系构建”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大学召开。来自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围绕“古代中国与日本”、“历史叙述与记忆”、“近代中国与日本”、“相互认识”四个专题展开交流和研讨。

德国哥廷根大学 Heinrich Detering 教授来访

2010年10月7日至9日,德国莱布尼茨奖获得者、哥廷根大学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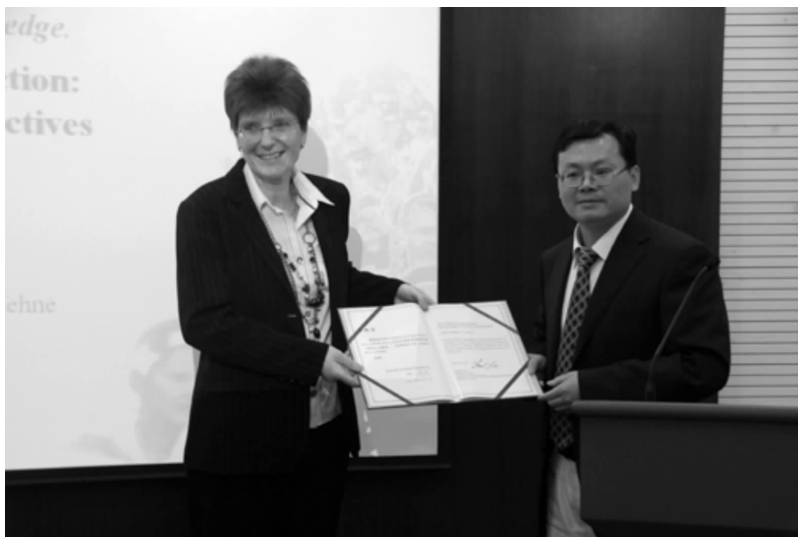
代德语文学和比较文学教授 Heinrich Detering 访问高研院,并应邀作主题为“Thomas Mann and Bertolt Brecht: Two Apostates of Buddhism?”的演讲,由何成洲教授主持。

美国纽约大学 Richard Schechner 教授来访

2010年10月10日至12日,美国纽约大学表演研究系知名学者 Richard Schechner(谢克纳)教授访问高研院,并做主题为“9/11 As Avantgarde Art?”的精彩演讲,受到南大师生热烈欢迎。

德国哥廷根大学副校长 Hiltraud Casper-Hehne 教授来访

2010年10月12日至14日,德国哥廷根大学副校长 Hiltraud Casper-Hehne(汉娜)教授访问高研院。10月12日,汉娜教授受聘为“高研院特聘访问教授”,并做主题为“Doubt grows with knowledge-Intercultural Interaction: Problems and Perspectives”学术演讲。



“汉学主义：理论探索”学术研讨会

2010年10月20日至21日，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举办主题为“汉学主义：理论探索”的学术研讨会。此次会议邀请了包括美国德克萨斯州立大学、香港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四川大学等高校和研究机构在内的众多知名学者与南大学者一起，就“汉学”、“国学”、“汉学主义”、“东方主义”等当前学术界和思想界的热点问题发表看法，进行思想交锋。

德国柏林自由大学 Erika Fischer-Lichte 教授来访

2010年10月20日至24日，德国柏林自由大学 Erika Fischer-Lichte 教授访问高研院，并做主题为“Finding and Forging an Other Theatre On the reception of Chinese theatre in Europe”演讲。

高研院特聘教授顾明栋来院工作

2010年10月15日至11月10日，高研院特聘教授、美国达拉斯德州大学中国文学和比较文学教授顾明栋来院工作，并于10月22日做主题为“汉学、汉学主义与东方主义”演讲。

美国纽约市立大学 Richard Wolin 教授来访

2010年10月28日至30日，著名新左派思想家、海德格尔研究专家、美国纽约市立大学 Richard Wolin(沃琳)教授访问高研院，并做主题为“The Wind from the East: French Intellectuals, May'68,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演讲，演讲由何成洲教授主持。

德国哥廷根大学 Frank Kelleter 教授来访

2010年10月30日，德国哥廷根大学美国研究项目主任 Frank

Kelleter 教授应邀对高研院做短期访问。来访期间, Frank 教授走访了部分院系, 会见了相关学者, 并做主题为“文化研究与美国电视”和“文学和电影改编—《绿野仙踪》与美国流行文化”的两场演讲。

徐兴无教授赴台湾大学高研院短期访学

2010年11月1日至12月1日, 南京大学文学院徐兴无教授赴台湾大学高研院做为期一个月的短期访学。徐兴无教授是高研院派出的第八位赴台大高研院短期访学的学者。

美国布朗大学副校长 Matthew Gutmann 教授来访

2010年11月8日至10日, 美国布朗大学副校长 Matthew Gutmann(古德曼)教授应邀访问高研院, 商谈学术合作交流事宜, 并做主题为“认识战争: 伊拉克战争美国老兵中的男性气质的分歧”的首场“南京-布朗论坛”的演讲。



我校学者参加第五届“两岸三地人文社会科学论坛”

2010年11月5日至9日,高研院组织南京大学文学院、社会学院、环境学院、历史学系等相关院系的学者12人参加由台湾中央大学举办的第五届“两岸三地人文社会科学论坛”,主题为“绿色启动:重探人与自然的关系”。两岸三地的学者们就“人与自然”、“环境变迁”、“绿色经济”和“环境正义”等主题进行了研讨和交流。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黄承元教授来访

2010年11月16日,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黄承元教授访问高研院,并做主题为“跨文化戏剧与全球化”演讲,由何成洲教授主持。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周启荣教授来访

2010年11月19日,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周启荣教授访问高研院,并做主题为“明清城市的士商、碑刻与公共文化:公共领域中的纷争、法律与地方秩序”演讲,演讲由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张志强教授主持。

工作坊“如何撰写欧美大学文科博士、 博士后奖学金的申请报告”

2010年11月23日至12月6日,高研院邀请挪威奥斯陆大学文化研究与东方语言系Rune Svarverud(鲁纳)教授举办主题为“如何撰写欧美大学文科博士、博士后奖学金的申请报告”的学术工作坊,就中国学生如何撰写欧美大学文科博士、博士后奖学金的申请报告问题做专门讲座并进行指导。

挪威奥斯陆大学 Rune Svarverud 教授演讲

2010年11月30日,挪威奥斯陆大学文化研究与东方语言系

Rune Svarverud(鲁纳)教授做主题为“The creation of a Chinese language for the modern sciences: International law and chemistry as cases”演讲。

陈蕴茜教授受聘为高研院院长助理

2010年12月1日,高研院聘任历史系陈蕴茜教授为高研院院长助理。陈蕴茜教授2009年至2010年在高研院做为短期驻院学者进行为期一年的工作,是高研院“现代知识体系的建构:中国与东亚”研究小组的召集人,同时积极参加高研院的“性别研究小组”、“城市与空间”小组等的学术活动。

以色列希伯来大学高等研究院院长 Eliezer Rabinovici 教授来访

2010年12月6日,以色列希伯来大学高等研究院院长 Eliezer Rabinovici 教授应邀访问高研院,就性别研究、战争反思、城市空间研究等专题商讨双方交流合作的可能,并就今后互派学者访问和学术交流等问题达成初步意向。



何成洲教授当选“国际易卜生委员会”主席

2010年12月16日,在挪威特隆瑟(Tromsø)举办的国际易卜生大会上,何成洲教授当选“国际易卜生委员会”主席,这是第一次由亚洲学者担任该会主席。该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在世界范围内推动易卜生的介绍、演出和研究,协调主办国际易卜生大会。国际易卜生大会通常每三年举办一次,2012年第13届国际易卜生大会将在挪威特隆瑟市举办。

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尹晓煌教授演讲

2010年12月19日至22日,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教授、哈佛大学博士、教育部“长江学者讲座教授”尹晓煌访问高研院,并做主题为“全球化与华人跨国民族主义:兼论美国人文与社会科学发展新趋势”演讲,演讲由何成洲教授主持。

李恭忠副教授赴台湾大学高研院短期访学

2010年12月20日至2011年1月20日,高研院驻院学者李恭忠副教授赴台湾大学高研院做为期一个月的短期访学。访学期间,李恭忠副教授将拜访台湾大学相关领域的学者、与台大历史系相关专业师生座谈,还将就相关专题发表学术演讲,并查阅文献资料。

高研院名誉院长张连珍女士演讲

2010年12月22日,高研院名誉院长、江苏省政协主席张连珍女士在南京大学做主题为“坎离两卦研读”的专题报告,报告由南京图书馆馆长、原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徐小跃主持。这是张女士在南京大学做的关于《易经》研究的第三次演讲。

学术沙龙“概念与记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新动向”

2010年12月27日，高研院举办主题为“概念与记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新动向”的学术沙龙。本次沙龙邀请旅日学者孙江教授、黄东兰教授做主题发言，历史系朱庆葆教授、政府管理学院张凤阳教授参加讨论。本次沙龙紧密围绕“概念与记忆”主题，从多个角度系统分析了当前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新领域、新课题、新方法，并对文科跨学科研究的发展趋势作出了展望。



作为先锋艺术的 9·11? (节选)

美国纽约大学表演研究系 理查德·谢克纳

在美国,拨打 911,读成“九一—”是紧急情况呼救的方法。而 9/11,读成“九十一”,则是 2001 年 9 月 11 日发生的对纽约世贸大厦和五角大楼的恐怖袭击的统称。自从 1968 年,“911”就成为美国的紧急呼救号码,所以,制造“9/11”这一短语的人难道不知道它以前的用法吗?这可能是一个巧合吗?或者恐怖分子选择的日期是巧合?在他们看来,袭击者正在打紧急电话吗?或者强迫美国人进入可怕的



的危机? 9/11 袭击后的不到一个月,也就是 2001 年 10 月 7 日,奥萨姆·本·拉登做了以下声明:“万能的上帝袭击了美国最脆弱的地方,他摧毁了它最伟大的建筑,赞美上帝。这就是美利坚,从北到南,从东到西,处处充满恐惧,赞美上帝。”

如果不是有关袭击的新闻和图片迅速扩散、充斥媒体,美国的东、西、南、北怎么会“处处充满恐怖”?如果不是人民的想象,哪里会成为美国“最脆弱的地方”?在本·拉登看来,谁是袭击者呢?不是基地组织,而是“万能的上帝”。就像摩西时代反抗埃及的瘟疫一样,上帝就是恐怖的制造者。

“9·11”事件是对想象力的一次成功袭击。美国人——与世界上的其他人一起——看到了他们以为永远不可能看到的事情,美国被恐怖主义者——那些非国家演员们“击伤了”。这是一种怎样的伤口?伊恩·波瓦(Ian Boal), 克拉克(T. J. Clark), 约瑟夫·马修斯(Joseph Matthews) 和迈克尔·沃茨(Michael Watts)写道:“从外观上看,美国在九月十一日遭受了失败。对这个国家来说,外观并不意味着表面的或附带的。在九月,受伤的是这个国家心脏的心脏。9月11日的恐怖首先是设计给人看的…九月的恐怖是不一样的(与广岛原子弹爆炸引起的德雷斯顿的大火爆炸相比)…它的前提是相信一幅画顶得上一千句话(从它希望消灭的文化中学到的)——在目前的政治条件下,一幅画本身,如果得到充分完好地展示的话,就是一项具体的、有效的政治攻略。”

不是我们知道的那些政治攻略,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条约或战争宣言,9·11炸毁了美国人的幸福感和安全感。所有看到9·11袭击的人都不会忘记它,而世界上很多人反反复复观看了它。从那天起,纽约市中心的地平线上就有了一个缺失了的标志:“这儿就是它们的旧址”成为伴随手指指点的最平常的解释。缺失就是纪念馆的主题,纪念馆将“包括两个建造在双塔遗址上的大水池。”

那么美国人的反应呢?当布什总统的演讲撰稿人把“震慑与恐吓”放入总统之口来描绘美国2003年3月对巴格达的袭击从而开始了第二次伊拉克战争时,他们有可能知道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的论断“崇高是那些绝对伟大的,无以比拟的伟大东西的名字”,那些“可怕的和绚丽的”东西。布什的目的是确保美国用壮观回报壮观。毫无疑问,演讲撰稿人知道哈伦·厄尔曼(Harlan K Ullman)和詹姆斯·韦德(James P. Wade)1996年由国防大学出版的那本书——《震慑与恐吓:达到快速控制》。而另一事实是,当拥有“新奇、未知和反传统耳朵的”新锐乐团 Bang on a Can 把斯托克豪森的曲

调作为 2008 年 1 月 1 日凌晨“在世界金融中心冬园进行的长达 12 个小时的晚会的高潮曲目时，他们也知道他的“能够想象的最伟大的艺术品”那句话。

另外，作为一次军事行动，作为一次（非常规）战争，9·11 袭击证明了它在长效上的成功。波瓦等人继续说：“牺牲的飞行员当然知道，撞倒双塔对于阻止资本的实际运转根本起不到或几乎起不到什么作用。但是，从长远看，资本的运转是与社会的运转——信仰与欲望模式、信心度、对美好商品社会的认可度——紧密联系在一起。从战略角度思考的恐怖分子们说，这些仍然是（永远都是）被永恒情感机器融合在一起的社会想象的不同层面。设想那些机器在某一瞬间被捕获，在此之上出现否定资本主义的绝妙形象。难道那还不够吗？这真的足以毁掉国家与社会的稳定了，并且还会产生一系列夸大和偏执，它们对资本主义世界秩序造成的长远政治后果是难以预测的。”

事实证明，2005 年发表的这些评论是非常具有预言性的。请看这一因果链：9·11 事件激起的反应是恐惧的、偏执的、巨大的，这一反应被新保守主义者利用，他们的野心是控制伊拉克石油和“民主化”伊拉克，使其成为中东阿拉伯国家的范例。实现这两个目标最有效的方法可能是（当时被认为是）一场简单的战争，其标志是 2003 年五月布什总统登上林肯号航空母舰，宣布“战事胜利完成”，伴随这种虚张声势而来的是对美国人民的误导。为了显示“他们吓不倒我们”，美国人民被要求支持“针对恐怖战争”，而同时继续过着正常的生活，没有征兵、限购商品或增加赋税这样的牺牲。事实上，赋税，特别是针对最富有的美国人的赋税被降低了。政府的模糊语言暗示：我们正在打仗，但是你们可以像没有战争一样生活。战争在升级，而美国政府和人民却不顾明天，拼命花钱。花钱是压制正在发生的事情的一种方法。很快，美国的个人、公司、政府因消费过度而陷入不可收拾的债务中。当 2008 年总统选举期间崩溃降临时，伊拉克战争就退到幕后，让位于经济了。但事实上，破败的经济正是“针对恐怖战争”的作战方式内在矛盾所造成的后果，即一场表面上因 9·11 恐怖袭击而发动的战争。这样，恐怖分子们实现了拖垮美国及其同盟国的全球化经济体系的长期目标。“世贸中心”不仅仅意味着两座高楼——它代表了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贸易体系。摧毁双塔所带来的层层后果远远超过了起初

的爆炸和倒塌。

回到艺术的问题上：除了斯托克豪森，一个人怎么能坚持把 9·11 对世贸双塔的袭击称为艺术品？这样一种指称的价值何在？把双塔的毁灭称为艺术品坚持了什么（表演）艺术？怎样维护了“所发生事件”的可靠性？它表明了 21 世纪第一个十年前后的什么样的社会道德？要讨论这些问题，我首先要追溯一下先锋艺术的历史，因为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是先锋派艺术家们在呼吁用暴力摧毁现存的美学、社会和政治体制。“avant-garde”一词源于法语，与“vanguard”之“van”相似，15 世纪末进入英语。古英语词典说，先锋指“行军时的先头部队”，也指各种情形中处于“领先”或“第一”。19 世纪初，该词被社会活动家、乌托邦主义者和艺术家们用来特指社会中的激进领先分子，保持了它的战斗性。

就算阿尔托规定了“戏剧环境下需要的犯罪形情形要比实际发生的相同犯罪恐怖的多”，但在今天，“真实”与“虚拟”之间的墙已经倒塌，“戏剧的”与“实际的”已经合为一体。并且我相信，9·11 所提供的正是阿尔托意义上的残酷景象——“大规模的恐怖”。

总而言之，众多先锋派重要艺术家和理论家一个多世纪以来坚持声称并不断重复的信息是清楚的，摧毁现存秩序、建立新的秩序或造就新的混乱。这些宣言仅仅是软弱的艺术家们的空虚幻想吗？或者他们是不是为先锋派艺术设置了一种基调，并将其带到大众娱乐中？实际上，所谓的“高尚艺术”与流行已经合并，就像“新闻”已经融入到娱乐中一样。另外，至少从克里斯·伯登(Chris Burden)让他的朋友射击他的胳膊开始(《射击》，1971)，许多行为艺术家弄伤自己，割开血管作为艺术，把自己挂在钩子上，屠杀动物，在艺术中使用各种各样的真暴力。艺术的近亲——宗教仪式——就包括鞭笞、刀割、割礼、尿道下切开术等等。流行文化里充满纹身、穿刺和美容手术，且不论其心理学及社会学意义如何，它们都激发了美的欲望。不是作为表现方式(像视觉艺术、戏剧或其他媒体里)，而是作为随时随地真实行为的装饰或仪式性暴力是非常普遍。然而，你或许会争辩说，除了宗教仪式，这些宣言、行为艺术和流行文化里的暴力实践大都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而这种文明正是本·拉登及其同伙明确鄙视，力图脱离并摧毁的。

但是，真的是这样吗？首先，通过改变身体的手段进行美容的行

为在全世界都存在。其次，基地分子和其他圣战主义者并不反对使用这些他们发现很有用的西方文化成分。本·拉登与他的同伙利用了从英特网到劫持飞机的所有媒体和高科技。圣战分子的精密技术揭露，盛行的那种认为他们是居住在“部落地区”的原始荒蛮人的说法是荒诞的。事实是，没有什么地方处于全球网络之外，甚至连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东北部也不例外，没有部落或人群是纯粹的他者。然而矛盾的是，西方与圣战分子在价值观上完全不同，但从技术上却分享着同一个全球体系。本·拉登通过英特网发布他的裁决和演讲录相，利用全球金融工具经营基地组织。在任何能发出声音的媒体上，基地分子与反恐战士在这个世界舞台上争夺着想象空间。

中西比较中的求同趋势与汉学主义之根源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曹顺庆

汉学主义是与汉学相关联的一个概念，它反映了西方对于中国研究的一种知识范型与学科体制的建构，这一过程难以避免受到西方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的影响。汉学主义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正是在一种“西方中心论”操控下的产物。在全球化语境下，西方强势话语占据主导权，中国知识形态的现代化演变为一种全面西方化的趋势，传统、历史、现实之间被割裂，而比较文学的“失语症”正是盲目



向西方趋同的一个重要表现。针对汉学主义产生的相关问题，“变异学”作为一种以异质性和变异性为基础的方法论和认识论，强调在一种交互、混生的状态下在异质文化之间形成一种自然合理的文化调节

机制,从而实现一种真正的内在平等。同时,在国际化语境中,文化主体应不断反思和调整自身与外界的关系,努力构建一种积极而真实的中国形象,并将中国文化的独特精神和内在活力带向整个世界。

众所周知,“汉学”一词在中文中的涵义十分丰富。汉代经学研究强调考据与训诂的治学方法,被称为汉学,而清代的“乾嘉学派”以严谨朴实的考据之学风,形成了与“宋学”相对的“汉学”。而我们在此所指的“汉学”又被称为“国外汉学”、“国际汉学”或“世界汉学”,是英语“Sinology”的译名。其中,“Sino-”这一前缀源于“秦”,但经过演变,具有了象征“中国”的含义,而“-ology”则有学问或学说之意。从字面上看,“Sinology”就是将中国作为一个整体性的研究客体来研究的学问。这样看来,我们可以概而言之,所谓“汉学”,特指的其实就是国外关于中国的研究。而这一概念的形成,是在近代才逐渐实现的,如傅海博(Herbert Franke)所说:“‘Sinology’的含义被解作‘关于中国的事物的研究’(the study of things Chinese),甚至更晚些,据考证是在1882年。因此,大约在1860年至1880年间,‘Sinology’这个希腊、拉丁语合成词便被普遍使用了。这正是汉语研究和中国总体研究被认作一种学术科目之时。”可见,汉学其实一开始就隐含着一种想要涵盖中国所有知识形态的学术趋向和文化理想。

而在实践操作上,这似乎更像是一种浪漫的学术情怀与奇特的文化冲动。由于研究范畴的宽泛化,形成了一种几乎无所不包的广义上的汉学,以上我们所说的更接近于此。显然,“关于中国的研究”的说法实际上是十分笼统而抽象的,似乎涵盖了中国几乎所有的学科门类,包括自然科学及一些不为人所知的边缘学科,而狭义的汉学主要牵涉的是在现代西方学科成熟体制下有关中国历史、哲学、语言、文学、艺术等相关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在此,后者是我们所要强调和论述的重点。

“汉学主义”一词是近年来才提出的一个概念,英译为“Sinologism”。“汉学主义”与“汉学”具有紧密联系,但又有根本性的区别。顾明栋在《汉学与汉学主义:中国研究之批判》一文中对此概念作出了这样的阐述:“汉学是一门几乎与中国研究同名的学问,本文提出的汉学主义却不是汉学的一种形式。而是一个相关而又不同的概念性范畴,该范畴总揽了西方长期以来试图将中国纳入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

体系的过程中所表现的动机、逻辑、原因、认识论、方法论及其特点。”显然，作者着重指出了汉学主义与汉学之间的不同之处，汉学主义在此更强调一整套西方的知识体系的中心意识，一种将非西方文化纳入其自身的企图。顾明栋进一步指出：“汉学主义并非以所有与中国相关的事物为中心的一个研究领域，也不是将中国作为专业学术调查的目标而进行的批判性活动，而是泛指从西方视角来了解中国知识和中国学术的一种方式。它不存在明确的本体论，但是存在一种认识论，这种认识论不是根据中国自身，也不完全从科学、学术或客观的观点来看待中国，而是有意或无意地根据西方观点来看待中国。”在此，作者强调汉学主义的认识论意义，这种认识论显然出于一种西方文化形态与思维模式，隐含着对异质文化自觉或不自觉的操控与影响，这意味着中国本土文化可能在这种转化中被改造、移植或发生变形。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认识论？顾明栋在《汉学主义：中国知识生产中的认识论意识形态》说：“汉学主义的问题主要是认识论和研究途径的问题，但是汉学主义不纯粹是一种认识论。从本体论上看，汉学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却是一种错误的意识，正如马克思和阿尔多塞所言，它是‘一种想象的集合’，因为它只是一组不精确的、扭曲的、充满偏见和歧视的观点和价值判断的堆积。”作者在此所批判的意识形态代表了西方文化价值系统和信仰体系的观念的集合，具有独断性与排他性的特征，能够对异质文化的整个知识结构生成、发展和传播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这种意识形态似乎与生俱来，甚至成为了“汉学”与“汉学主义”之间不可摆脱的噩梦。周宁在《汉学或“汉学主义”》一文中说：“广义的汉学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性，包容在汉学主义中；狭义的汉学，则被假设为一门严肃、严谨、客观真实的科学，无关于功利与权力。但是，即使在汉学成为‘科学’或‘学科’时，也难免有意识形态因素。只是这种因素表现得更为隐蔽，渗透到学科的基本假设与建制规训中。”

具有鲜明的西方意识形态在这里将“汉学主义”与“汉学”几乎合二为一。在此出现了一个奇怪的逆转，表现为：“汉学主义”并非脱胎于“汉学”，反过来，它不但可以覆盖或代替“汉学”，而且是“汉学”的真正本质和根本所在。当然，我们必须承认，这并非概念上的排序游戏。因为“汉学主义”所表述的现象和问题在其概念本身出现之前就已是

一种文化实践和客观存在。“汉学”与“汉学主义”的概念之争本身就带有一种文化批判意识，它针对的是一种文化强权所造成的文化对立，但另一方面，它体现出一种受压制的弱者心态，一种被操控者要求反抗的强烈愿望。可以说，“汉学主义”的焦点在于，西方眼中的中国并非真实的中国，是一种被有意或无意操控的西方化的中国，而这种遭受遮蔽的中国形象对中西文化的交流产生了不可忽略的消极影响。

从本质上说，汉学主义中所牵涉到的西方对中国的操控和影响及其意识形态因素正是“西方中心论”(the Western Center Theory)的集中体现。提到“西方中心论”，多数学者首先会把它当作一个贬义词，甚至会条件反射般的出现一种反感与敌意的情绪，这是可以理解的。不可否认，“西方中心论”代表了一种文化(种族)优越感和根深蒂固的文化等级制度意识，它将西方文化形态视为一种理想化的高级文明发展模式，以西方价值和信仰观念及知识体系当作一种可以广泛推广的普遍性合理化存在，往往忽略了异质文化的特殊性和不可替代性。无疑，西方人所从事的汉学研究在有形或无形之中必然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

20世纪中期以来，汉学发展进入一个繁荣昌盛的新时期。但在中西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对峙的背景之下，异质文明之间的冲突与对立不但没有减弱，反而以一种更为隐秘而激烈的方式持续下来。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的“文明冲突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认为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在他看来，东西方文化具有不可跨越的差异，而“儒家文明”(Confucian civilization)被想象为一种西方文明的对立面，成为挑战西方世界主体地位的巨大威胁。而法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历史之终结与最后一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更是把西方的民主自由体制视作一种人类历史发展的终极模板，这无疑是将西方文化体系作为一个主导的、普适性的和不可拆分的理想文化形态来构想整个世界文明。可以说，西方不少汉学研究者潜意识中无法摆脱以西方主体为中心场域来评判和思考东方文化，对中国文明所产生的有意或无意的误解成为了无法避免的客观现实和历史趋势。与此相对应，在东方反观西方的时候，实际上面对的也不是一个真实、自然存在的西方，而是会受到自身各种传统价值观和信仰的控制和影响，形成一种强烈而不可

转移的文化对抗力。但为什么这种出于原始的自我中心化的力量无法呈现呢？从汉学研究发展史和人类学的维度综合考量，历史上“东方中心论”或是“中国中心论”与“西方中心论”必然是同时存在并发挥作用的，在中西文化均衡的情况下，后者的效应被削弱乃至消解了，而后者真正的得势实际上是击败前者的直接结果，这一严重的后果在 20 世纪所造成的影响得到空前强化，或者说，对于东方人而言，是空前恶化。而汉学研究正是在西方走向世界的中心这一历史演变中逐渐发展成为了一种令人生畏的汉学主义。

然而，进入 20 世纪以来，汉学研究的文化身份变得更为复杂而可疑。一方面是因为汉学研究的对象、方法论及整套思维观念模式的全面西方化。而另一方面，汉学研究的主体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一个较为独特的现象就是在国际上出现了大批华裔汉学家，他们成为了汉学研究主体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表面上看，“汉学”成为了一门名副其实的显学，而其中非西方的研究者为其学科的客观性和公正性带来了可能。作为他者的中国，缺乏主体话语权力，那么华裔知识阶层是否能代表中国自身表达属于自我的言说呢？这其实是值得怀疑的。回顾“汉学”或“国外汉学”的历史发展进程，由于其多重文化身份和西方学术体制下的特殊知识背景，华裔汉学家往往很容易受到强势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影响，自动让渡了中国文化的合法性，演变为西方中心主义话语下的实践者，并参照西方的知识生产规则 and 标准来重新建构和评判中国文化价值系统。有学者将这一类现象称为“自我殖民化”和“逆向族群中心主义”。因此，将非西方文明作为参照物纳入西方主体意识之中就成为了一种再自然不过的事情。而在这一过程中，作为强势文化的西方将中国文化的主体意识逐步消解和剥离，最终使中国形象一步一步成为在西方知识秩序下被规训的客体和投影。

汉学主义与东方主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赵稀方

东方主义和汉学主义有着共同的发现，也有着共同的问题。

Orientalism 在萨义德那里有三重意思，汉语无法同时翻译。它首先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学科“东方学”，这正是大陆汉译本的译名。萨义德《东方主义》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正是在梳理西方“东方学”学科的流脉，不过其主要目的是呈现西方的东方主义的思维方式和话语机制，这里东方主义的思维方式和话语机制是萨义德所强调的 O-



rientalism 另外两种重要含义。西方东方学的正式出现，一般被认为是在 1312 年，这一年维也纳基督教公会决定在巴黎、牛津等大学设立东方学系列教席。《东方主义》一书对于东方主义话语却追溯得更早，早至雅典戏剧埃斯库罗斯的《波斯人》。现代东方学的产生开始于 18 世纪，东方学在体制和内容上的巨大飞跃，恰恰与前所未有的欧洲扩张相吻合。《东方主义》一书详细考察了古代东方学和现代东方学的不同阶段的特征，探讨了东方主义的运行机制。在萨义德看来，作为欧洲的“他者”，东方从来都是欧洲文化的一个内在的组成部分，诸如理性、发展、人道、高级的西方和反常、落后、愚昧、低级的东方这种想象和构建东方的模式，体现的是东西方书写与被书写的权力关系。从学科到思维方式和话语机制，这是萨义德的的发现。汉学之于中国的关系，应该大体类似。

不过,在《东方主义》中,萨义德囿于一种文化决定论的视野,将整个西方知识纳入了东方主义的范畴,而忽视了西方知识界内部的差异。这不仅仅表现在萨义德没有充分注意到欧洲东方主义思想内部的差异,更表现在他否定了欧洲内部的反殖民话语。《东方主义》出版后,批评家对于萨义德完全不提及这一领域的先驱很不以为然。在受到批评以后,萨义德开始承认并论述了西方自身的殖民主义批判传统——这其实也是承认自己的后殖民批评的知识来源。

汉学主义的情形也一样,汉学内部事实上也有左右之分,甚至有为国人所注意的对于殖民性的揭示。杜赞奇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研究汉学,比较熟悉印度庶民研究的路数,自述受到后殖民理论、特别是察特吉关于民族主义、殖民主义研究的影响,因此,他关注第三世界的殖民性问题。在《从国家拯救历史》一书中,杜赞奇详细地分析了近代以来西方国家主义史学逐渐成为中国史学主导的过程,并打捞被国家史学所压制从而逐渐被人们遗忘的“历史”。在“理论原型”的部分,杜赞奇首先追溯了线性目的论和进化论的启蒙历史观。杜赞奇声称,他并不反对启蒙的价值,他承认启蒙历史在民族兴亡和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所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在进化的秩序中建立中国现代民族主体,使中国生存于一个竞争的时代,这是历史和政治的需要。不过,我们不能因此而忘记了启蒙进化的历史是西方达尔文主义的结果,它同时是一种西方种族性话语,以这种民族国家建构历史,必然意味着接受这种西方/东方、进步/落后的等级秩序和西方中心观念。同时这种叙述结构必然压抑和消除了其它的历史叙述,其后果是让我们今天习惯于倒果为因,将现代中国历史简化为民族国家生成的历史。

汉学主义和东方主义有共同之处,在形态和功能上也有较大差异。东方主义处理的是西方和伊斯兰之间的关系,汉学主义讨论的是西方和中国的关系,由于历史和现状的不同,东方主义缘自于自古以来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冲突。从7至17世纪伊斯兰帝国对于欧洲形成了长达一千年的政治和宗教威胁,这是基督教文明敌视伊斯兰的根本原因。萨义德之所以得出“差异意味着敌意”的绝对的观点,缘于他论述的对象——欧洲——与伊斯兰关系的特殊性。

中国则不同,它自古以来一直封闭于东亚大陆,与欧洲少有来往。在利玛窦《中国文化史》中,我们看到,利玛窦劝告教皇不要顾虑中国

儒家思想的支柱——敬祖观念，因为它并不是一种宗教，而只是一种伦理仪式，因此中国人的思想与基督教并不矛盾，中国人可以在不放弃传统思想的情况下入教。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思想并不像伊斯兰教那样与基督教敌对，这是欧洲人对当时的中国文化有好感的重要原因之一。欧洲对于中国文明的表现即不是以敌意开始的，西方第一本关于中国的学术著作是西班牙人门多萨(Mendoza)1585年的《大中华帝国史》，这本将中国描绘得强大而发达的史书以七种语言出版了46个版本，成为欧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居住了27年(1583—1610)的利玛窦在《中国文化史》说，“他在向欧洲人讲述中国时，同样认为中国政府极有效力而且非常强大。”其后西班牙水手品托(Pinto)的《游历者》和耶稣会成员白晋(Bouvet)的《中国史》“把对中国的美化、理想化，粉饰和浮夸推向了极至。”18世纪20年代甚至出版了一本题为《中国——欧洲的榜样》的书。史景迁认为，对于中国形象的表现取决于欧洲，而不取决于中国，这个看法倒与萨义德的观点相一致。当然，这种正面评价同样是一种想象，它并不取决于中国，而取决于彼时西方的政治需要。不过，在萨义德看来，“归化”是一种常态，正如中国人对于西方，只有当这种“归化”成为一种学科以至与暴力联系起来的时候，这才真正可怕。这种情形只有到了近代才开始。

汉学主义在中国的功能也有其特殊性。作为昔日的中华帝国和今日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自有其强大的意识形态的控制，汉学在服务于其自身帝国主义的目的之外，同时具有瓦解中国意识形态的正面意义。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明显是冷战的产物，但是这本书对于沈从文，张爱玲等人的发现却是一个贡献，这是新批评与社会学批评、文本美学与政治的差异。

从方法上说，东方主义给予我们的启示应该是什么呢？并不是简单的不是民族主义和汉学主义。从内容上看，汉学主义是对于东方主义的移植，从功能上说却不然。东方主义在西方世界本是一种针对“西方中心”的批判理论，但它在中国就顺理成章地成了批判西方、维护民族主义的“保守主义”。一种理论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所起的作用是完全不同的。在西方语境中，东方主义是一种站在边缘立场批判西方主流文化的理论，显示出文化批判的意义，但对于西方文化主流的批判到了中国的语境中，却产生了完全不同的意义。按照通常的说

法，“启蒙”（亦即西方现代性话语的确立）在中国一向就被“救亡”所压倒，也就是说，民族主义是主流，而现代性话语则处于边缘，因此在西方是边缘对于主流挑战的后殖民理论在中国则成了主流对于边缘的压抑。东方主义带来的是汉学主义、民族主义，却没人采取边缘立场对中国文化的内部格局进行分析，对中国帝国内部的民族关系进行清理。在民族国家问题上，中国与西方并不相同，不过民族问题还是尖锐存在的，需要我們进行批判性的分析。

“世界批评理论”的可能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赵毅衡

近十多年来，文学理论，文化理论，正在汇合成一个具有相当普适性的“批评理论”，而且这个批评理论正在成为“世界批评理论”。批评理论有四个支柱：马克思主义，现象学/阐释学，精神分析，形式论。其余的各种理论（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性别研究）可视为其延伸。只要我们回到四个支柱理论，我就不会永远陷于“不是跟着说，就是自言自语”的两难之境，不会以西方“新出”学说为学术时尚疲于奔命——要不就是固守十九世纪之前的本土思想材料，抵制“西方的”批评语言。事实证明，中国学者能够对建立一个普适性的批评理论做出贡献。



近来关于“世界文学”的讨论很多，说有说无，说可能说不可能，说当代文学“本质是西方化”，说它“正在世界化”，各种观点都有。但是没有人提到一个更加实实在在，可能性和必要性都更大的过程，就是

一个“世界批评理论”正在形成。

我曾经把“广义叙述学”的主要范畴在几个学校做过演讲，也在叙述学的专业会议上做过发言，得到的是一片沉默，没有人赞同，也没有人反驳，更不用说著文支持或驳斥，似乎这个建议中没有任何值得争论的内容。但是对一些传统小说叙述学中的细节，西方学者已经讨论过多年的问题，中国学者的争论却很热烈。争论的中心似乎是：谁对西方叙述学理论的理解更正确？

这个局面只有一个解释：中国学界还没有准备好把批评理论变成世界批评理论，最大的雄心也只是用中国古籍把某一种西方理论“中国化”，而这种做法对于建立一个现代批评理论是远远不够的。中国人一百年来的两难之境：不是接着西方人说，就是自言自语。问题是，一个世纪至今的历史已经证明，跟着说会永远是跟着说，自言自语会永远是自言自语。要建立一个世界性的批评理论，取决于非西方学界对自己工作的基本态度：创立一个世界批评理论，首先要求我们不排除，把全部批评理论（而不只是十九世纪末之前的中国文献）当做中国学界“自家事”；更重要的是，我们不能等着接受批评理论世界化，这个前景需要我们积极参与才能实现。

在古代汉语或现代汉语中，都没有“文论”这个双声词。这个缩语却在中国学界坚持了下来，“文论”本身的发展，让中国学界得了这个缩写词的便宜。六十年代以来，这门学科的重点，已经从文学转向文化，“文化转向”已经使文论面目全非。“Literary Theory”这个词已经不适用，不仅文学批评已经多半是“文化进路”，而且研究对象也是整个文化。近四十年来，文学系、艺术系、传媒系、比较文学系、哲学系，都转向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各国学界为如何命名这门学问伤脑筋，中文却以一个模糊双音词安之若素：“文学理论”与“文化理论”，都是“文论”。

最近十多年，情况又有发展，这门学科目前又在溢出“文化”范围，把有关当代社会演变、全球化政治等课题都纳入关注的范围。因此，近年来这门学科越来越多地被称为“批评理论”(Critical Theory)。当代文化的急剧演变，以及这个理论本身的急剧演变，迫使这个理论体系改变名称。批评理论的目标学科宽大得多，文学基本上全部进入，但是过于技术化专门化的文学研究不算；文本源流，考据训诂等传

统学术，依然是语文学科核心，不属于批评理论的范围。

而文化领域之外，政治经济领域却越来越成为“批评理论”的关注点。全球化问题、第三世界经济受制宰问题、“文明冲突”、意识形态、世界体系、第三条道路问题、贫富分化、穷国富国分化、东西方分化、弱势群体利益、性别歧视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批评理论特别关注的目标。所以，在许多名为同类的文集、刊物、课程提纲、教科书中，我们会发现所选内容，大致上三分之一是文学理论，三分之一是文化理论，还有三分之一与人类问题有关的哲学（福柯称为“人的科学”Human Sciences）。这样一看，“文论”一词（哪怕是作为“文化理论”的缩写）已经不合适了。

支持二十世纪批评理论的，一直是四个支柱体系。二十世纪批评理论的最重要思想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从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卢卡奇（Georg Lukacs）开始，到法兰克福学派，基本完成了二十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第二个思想体系，是现象学/存在主义/阐释学（Phenomenology/ Existentialism/Hermeneutics）。这个体系，是典型欧洲传统的哲学之延续，他们一再声称结束欧洲的形而上学，或许正是因为这个传统顽强，所以需要努力来结束。当代文论的另一个思想体系，是精神分析（Psychoanalysis）。这一支的发展，一直陷入争议，但是其发展势头一直不减。只是这一派的“性力”出发点与中国人传统观念过于对立。当代文论的形式论（Formalism）体系，是批评理论中重要的方法论。这一支，似乎是“语言转向”（Linguistic Turn）的产物。但是语言转向至今并没有结束，“文化转向”是其延续方式之一。在当代，流派结合成为惯例，对当代批评理论作出重大贡献者，无不得益于这四个体系中几种的结合。

说批评理论有四个支柱，其余都是延伸，自然是过于整齐的切割。我只是想指出，现代批评理论已经覆盖了整个人类社会文化触及的所有课题。只要我们能时时回顾这四个基础理论，我们就完全不必跟着西方“最时髦理论”奔跑，我们就能摆脱“不是跟着说，就是自言自语”的两难之境，就能在这个基础上对一个世界性的批评理论做出独特的贡献。说这样一个理论体系是“西方”的，从至今为止的主要参与者来说，应当说是的。四个支柱理论体系和四个“后”体系，创始人和主要发展者，甚至今日的主角人物，都是西方学者。

其实在英语世界，整个批评理论体系常常被称为“欧洲大陆理论”（Continental European Theory）。在主要的批评理论家中，德语（德国、奥国）和法语（法国、瑞士、比利时）的思想家占了一大半，东欧与南欧也不遑多让。成对比的是，英语国家比较少，与幅员版图和高校数量正好相反。英语国家受经验主义传统之累，高校再发达，也只能起鼓风作浪的传播作用。欧美之外的人，对批评理论扮演过重大作用的，主要是“后殖民主义者”。这一派的几个领军人物都是在英美接受教育，并且在英美大学执教的阿拉伯人和印巴人。无论如何，批评理论，不是一个“西方理论”，不是一个“东方理论”，而是这两者之间张力的产物。

批评理论世界化的第二个原因可能更重要：批评理论需要一个体制作为批评对象，现在批评理论的对象是西方社会文化和政治体制。但是这个体制正在向全世界扩展，因此这个批评理论，也就是针对正在向全球延展的西方式体制（例如“异化符号消费”，“社会泛艺术化”）的批评理论，这从反面证明它不会永远是一个“始于西方，终于西方”的理论。

批评理论是对现代化进程的一种思想回应。现代批评理论是在二十世纪初在欧美的许多国家没有任何人际族际协调地发展起来的：弗洛伊德不了解马克思，胡塞尔不了解索绪尔，雅克布森不知道瑞恰慈或艾略特，皮尔斯不知道索绪尔，批评理论第一代奠基者，没有可能作有意识的应和。二十世纪初，这些思想者都发现有必要从现象后面寻找深层控制原因：葛兰西在阶级斗争后面找到文化霸权，弗洛伊德从人的行为方式后面找到无意识中里比多（性冲动）的力量，胡塞尔从经验与事物的关联中找到意向性这纽带，而索绪尔与皮尔斯分别看到人类表意的符号规律。这些不约而同的“星座爆发”是文化气候催生的产物，正因为它们是对同一个文化发展进程的思想应对，它们对表面现象有共同的不信任。这种共同立场，也为它们日后的融合打下了基础。

批评理论出现于欧洲，是因为在二十世纪初的欧洲出现了现代性的挑战，学者普遍感到了现代性的文化压力。那时在世界其它地方尚未出现这种对思想的压力。早一些，在十九世纪，欧洲有文学理论、文化思考、哲学探讨，学科之间并没有构成一个具有共同倾向的运动。批评理论的突然出现（虽然这个名称是近年才有的），的确是现代性首

先对欧洲思想界压力的产物。

由此，我们可以辩明另一个问题：既然十九世纪的西方没有批评理论，十九世纪的东方（例如中国）没有这种理论也是很可以理解，也没有什么需要自辩的。等到现代性的挑战成为世界现象时，翻译已经发达，国际学界交流已成常规，大学教育成为思想融合的阵地。此时东方（包括中国）的批评理论，已经不可能与世隔绝单独发展，我们可以大胆预言，批评理论今后的发展必然向“世界批评理论”发展，因为东方学者不得不回应现代化进程提出的各种问题。

预言批评理论将世界化的第三个原因是东方民族的文化遗产已经开始进入批评理论的大体系。近三十年，在全球范围内，人们渐渐认同一套新的价值观，例如多元文化、地方全球化、弱势群体利益、环境保护意识、动物保护意识、反无限制科技等等。很多新价值提倡者声称他们是在回向东方智慧：对生态主义的西方信徒，道家经典是他们的圣经，道法自然是他们的响亮口号；反对“科技无禁区”的人，一再重提老子关于过分智巧的警告；动物保护主义，与佛教的众生有灵有显然的相应；对残废人、智弱者的关怀，更是佛教式的悲悯；至于老年人权利，当然与中国儒家传统一致。至少，因为本是我们的固有思想，东方人应当对这些新价值并不感到陌生，甚至应当有自然的亲和。

那么，结论是什么呢？在最近的未来，非西方民族将会对批评理论做出贡献，但是不会完全用一个东方化的理论取代它，而是把它变成一个真正世界性的理论。批评理论已经是整个人类的财产，而当代东方的文化气候已经开始召唤这样一种世界化。只要我们回到四个支柱理论，而不是跟着各种蔓生的支脉奔跑，我们就不会永远陷于“不是跟着说（以西方“新出”学说为学术时尚），就是自言语（固守十九世纪之前的本土思想语汇）”的两难之境。

也就是说，批评理论的当代化与“批评理论世界化”，正在同时进行，不久后我们会信服这两者其实是同一个命题。

这不是向“普适主义”投降，任何理论的适用性都不需要预设，要的只是在批评实践中检验，在这个全球化时代，任何理论都远远不够成熟。所谓“发展”，并不是在现成的理论框架中填充中国材料。恰恰相反，中国学者能做出的贡献，不是证明批评理论必然“非普适”，而是证明现有的批评理论“不够普适”。

“求真之学”抑或“权力话语”？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叶 隽

我们试图从汉学主义入手，讨论其学术话语背后的权力因素制约，并进而影响到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我殖民潜意识。提出“求真之学”乃是一个以学术为志业者的基本品格，也是事物原相的有机二元组成之一。我们一方面应直面西学全球化的后果，注意汲取西学中具有普世价值的那部分内容精华；另一方面应努力建构属于自身的东方现代性。总体而言，就思想导向而言，西学不具备领头羊的意义；



而在具体的范式建构、制度确立等方面，包括形而下的器物争雄领域，西学具有相当启迪乃至主导型意义。所以西学全球化、汉学主义、权演论这几个概念是三位一体、彼此关联的。作为学人，我们应在坚守“求真之学”的基础上努力探寻“求智原则”，既要考察以亚洲文化为主体的东学生成，凸显作为西学互补的东学价值，更要关注“求智原则”可能促成的“东西二元互补结构”的现代性概念的重建问题。

汉学主义是否确实存在？应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的。但充其量，其理论内涵和意义不太能超出萨义德(Said, Edward W.)所揭示的“东方主义”概念，在他看来：“东方并非一种自然的存在。”“作为一个地理的和文化的——更不用说历史的——实体，‘东方’和‘西方’这样的地方和地理区域都是人为建构起来的。因此，像‘西方’一样，‘东方’这一观念有着自身的历史以及思维、意象和词汇传统，正是这

一历史与传统使其能够与‘西方’相对峙而存在，并且为‘西方’而存在。因此，这两个地理实际上是相互支持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反映对方的。”他实际上可以说是典型的福柯策略，即解构既定的学术概念，从中剥离出“权力”主导的因子来。此举虽可一时间耸人听闻，但在学术上是不太能站得住的。因为不但像汉学这样的学科有可能存在所谓的殖民意识；就是梵学、闪学等各种东方学也都包含着类似的因子，这样论述不为无理。但如果仅仅局限于此，则很可能陷入到“权演论”的怪圈中去。

要想揭破这个迷障，必须借助易经的二元思维，即太极图的“阴阳相生”。由此解释，则一个客观上的“东西二元结构”是存在的，按照《易经》的思维，太极之中有奥义蕴焉。这在动物的“阴阳二性”方面体现的最为明显，阴阳之调和与刚柔之相济，乃万物生成的根本原理；同样，在人类文明史的进程中，也存在着这样一种基本二元结构，这就是所谓的“东西二元”。东方性、西方性的相合，才可能构成一个完整的人类文明史的整体，在这里就是所谓的“现代性”。现代性的基本概念仍应将其定位为与“故代性”相应的二元相峙，正是因为与故往时代的相异，所以才成其为现代。而这样一种与故代的区分，显然不应简单地归结为某种具体文化的特征，而是各种文化可以共享的。所以，现代性的特质也不是某种文化唯一的，而是可以具有不同的表现方式的，因为“从现代来看，各大传统之间虽有相互影响的痕迹，但都自成体系，源远流长”。相比较自轴心时代以来故代的“歧异”，那么现代的特点或许是“趋同”。如此，我们或许需要从更深层的结构层次去发掘其可能性。具体言之，我们需要在承认“多元现代性”的前提下，特别关注“二元现代性”结构，也就是说，由“西方现代性-东方现代性”互动生成的复杂关系。相比较西方现代性概念的相对明确，那么“东方现代性”反而是迫切需求索的概念。

在文明结构的三层维度中，最终的现实胜负往往决定于器物的杀伤性程度。一方面我们必然要承认“权力话语”的合理性一面，因为这个世界本就是由这种权力规则所决定的；但另一方面我们更要脱出西方之窠臼，因为人类不可能满足于现实苍凉的悲惨局面，否则那就不是为万物之灵长之人了。我们需要始终以“易道元一”的思维考虑问题，既要能拆解诸如“东方主义”、“汉学主义”等在“权力话语”笼罩下

而彷徨难出的困局；也要能营造一个更为世人所肯定和瞩目的有利规律。只要我们把主要目光始终聚焦于历史上那些真正的伟大人物，我们就必然能够发掘出他们身上所隐藏的“大道之行”的可能秘密。所以，我想说作为东方人，我们应当确立“东方现代性”的命题。何谓“东方现代性”，就是在太极图所展示的“阴阳相生”格局中寻求与西方相辅相成、相反相立的那种“东方位置”；就是寻求那样一种不以正义公理自欺，而很可能恰是大道所在的可能。我想在这里或许值得提出一个特别的概念，就是“求智原则”。与一般性的求知原则不同，“求智原则”包含了求知、求理、求正义等主要含义，也涵盖了诗人、哲人、学人等多种层面，甚至包括政治家、商人等，因为要予以一种智慧答案的寻求，寻求大智慧。它是一种超越性的概念，即在商人求利、政客求权、学人求知之外，可以提供大家的一个共享平台，即众人都需“求智”，没有一种大神通、大智慧，人类不可能走出永恒的误区。

我们至少应当承认，西方在建立世界性的现代学术方面，在引领人类向进步发展方面，都是作出了卓越贡献的。当然，文明走到今天，我们确实应该反思、为什么以西方为主导的全球化进程，竟会把人类引领到这样一种境地？实际上西方伟大的学者、诗人和哲人都在反思这个问题，虽然他们都尚未能从根本上把握到症结所在，但毕竟我们看到了反启蒙的力量，以及浪漫思脉的兴起，包括秘索思(Mythos)思维的发现。但欧洲与北美是不同的，欧洲学者与诗人，基本上都是能够在一种宏观的大视域中以一种对自身、对历史负责任的立场上来确立自己的运思方向；而北美则不同，其基本思考不脱利益思维，而偏偏以民主先驱、世界典范自诩，其谬也昭然。虽然北美人是欧洲人的嫡裔血脉，其所接受文化资源亦同，但为何产生出如此不同的“南橘北枳”现象，实在是令人玩味。

我们首先必须建构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第四十二章》）的那个“三”和“二”来。天地生焉，万物存焉，作为求知者，我们首先当恢复这个“三”与“二”，西方是一个相对明确的一体性存在，而在我看来，东方则始终是一个有待建构的“概念”。这主要指其相对明确的地域认同概念、文化认同价值、逻辑思维方式。当然我们也要特别关注那个“二元三维”结构，即那个“三”的因素，即东西方之间的流力因素，也就是说在地理空间上是那些居于两者之间的文明

体；在文化结构上则是那些率先并主动汲取异质文化并能创化转变的文明体。对于中国学者来说，一方面进一步去探索、理解和阐释作为“二元之一”的西方，同时更紧迫地则是去识知、认同和建构那个“二元之一”的东方，因为我们自己就身在其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东方主义”作为一面反光自照的镜子，当然有其价值；而有汉学主义，也就可以有梵学主义（印度主义）、日本主义等等，它们也都可以作为具有透视功能的小镜子，不断地映射出我们对世界多元性的认知不足。但更重要的当然还是，我们的问题主要是“虚浮无根”，自己在传统文化方面还有太多的课程需要补上，甚至需要从头再来；另一方面则应当特别注意东方现代性的建构问题。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来归纳理解“汉学主义”给我们的启迪：破解“权力棋局”，重视“权演语境”，凸显“求真之学”，守定“求智原则”。既要充分意识到西学全球化、汉学主义、权演论这三个概念的三位一体、彼此关联性；同时作为学人，应坚守“求真之学”的基础上努力探寻“求智原则”；既要考察以亚洲文化为主体的东学生成，凸显作为西学互补的东学价值，更要关注“求智原则”可能促成的“东西二元互补结构”的现代性概念。说到底，就是藉中华之智慧、成东方之一元、重构现代性。

如何让发展更加包容起来？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高传胜

已经成为大多数国家实践的包容性发展，在社会矛盾和问题不断凸显的今天，应该成为中国在新的发展阶段的新的发展战略。包容性发展，是一种内容更加全面、主体更为兼顾的发展理念，它不仅强调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而且关注包括弱势群体在内、却又不局限于此的全体国民的发展，因而尤其注重发展机会的平等与发展利益的共享。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创造了世界发展奇迹的同时，也累积了不少矛盾和问题，其中不少问题都需要通过增进发展的包容性来加以克服和解决。诸如居民消费迟迟难以启动、国内需求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不强问题，配套改革未能跟上、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健全而造成的“看病难”、“住房难”、“上学难”、“养老



难”、“就业难”等问题，城市管理不规范、缺乏人性化而带来的社会冲突，拆迁补偿不公、安置不当而产生的社会矛盾，市场监管不力而产生的食品、药品安全问题，行业规制滞后而导致的投机现象蔓延至民生产品，包括学前教育在内的基础教育不平等而带来的贫困代际转移问题，经济性公共服务供给低效而造成的人才外流、劳动力大规模流动和落后陷阱现象，等等。

针对当前实际，在“十二五”期间，中国推进包容性发展必须从机会均等和利益共享两方面着力。促进机会均等的重点是加强婴儿营养和包括学前教育在内的基础教育，切实保障社会起点公平，防止贫困的代际转移；健全社会救助体系，增强社会安全网的保障功能；优化医疗卫生组织体系，破除垄断，促进竞争，既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多层次医疗卫生需求，也实现更多人投身医疗卫生服务行业的发展愿望；顺应经济集聚化发展趋势，提供更加便捷的公共服务体系、更具利益共享性的制度安排，让人们更方便地接触更趋城市化、集聚化的发展机会；全面推进服务业加快发展，给人们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更好的发展平台和更广的展示舞台，“让产生经济增长的演员们把他们的戏演好”。

在推进利益共享方面，其重点包括：抓紧完善相关政策，让农民工及随流子女能够充分享受城市公共服务的阳光普照；运用名义账户（NDC）思想，改造当前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简单相加”的统账结合型养老保险制度为“混合型”统账结合制，重构覆盖全民的统一养老保险体系，解决养老保险体系目前存在的诸多问题；推行弹性扣除、以家庭为单位的综合所得税制，让公共政策更具周全性；改善国民收入分配体系，调节居民收入差距，让经济发展的收益能与居民共享；改进政府管理方式，完善政府在制度建设、组织协调、宏观调控和市场监管等方面的职能，让包容性发展能得到应有的切实保障。

江湖：中国传统社会与文化的另类解读

南京大学历史系 李恭忠

江湖原来指具体的物质空间，即江河、湖泊。《庄子·内篇·逍遥游第一》记：“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虑以为大樽而浮乎江湖，而忧其瓠落无所容？”后来泛指政治权力边缘之处的社会空间。《史记·货殖列传》记：“范蠡……乃乘扁舟浮于江湖，变名易姓……”唐朝诗人杜牧的《遣怀》这样说：“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倖名。”



从社会意义上来说，最初级的江湖，就是美国学者施坚雅所说的“基层市场圈”(Standard Marketing Area)。按照他的模型，这个市场圈方圆大约 50 平方公里，1500 户人家，7000 人口，他们生活在大约 18 个左右的村庄里，距离集镇不超过 8 公里。这是一个集交易、婚姻、结社、娱乐和宗教活动于一体的复合社会圈，其最基本的特征就是非熟人社区。扩大的江湖，则可以包括庙会、码头、山林、湖沼、河海，乃至城市。

从人口类别来看，江湖的主体是流民与游民。流民和游民是相对于生活在固定的乡土社区里的居民而言的，二者有相当的交集，古代文献里这两个词语也经常相提并论或者混同使用。同时，流民和游民又有一定的区别。流民是一个中性的概念，指一种暂时或常规性的移民，他们在空间上背井离乡，在社会关系上无所依归。游民则是一个带有强烈价值判断的概念，强调社会意义上的游荡四方、无固定职业。

从职业门类来看，江湖的主体是三教九流。三教指儒、释、道，九流的含义则有多种不同的说法，而且有上、中、下之分。一种说法是，上九流指帝王、圣贤、隐士、童仙、文士、武职、工、商、农；中九流指举子（落魄文人）、行医、风水、占卜、相面、丹青、僧、道、琴棋；下九流指皂隶、衙役、升秤、媒婆、走卒、时妖（拐骗及巫婆）、盗、窃、娼。这种说法表明，江湖的主体几乎无所不包，从帝王将相到乞丐盗贼，都与江湖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

江湖的基本特质，就是非熟人社区和非主流秩序。传统社区的特征，如同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所言，是一种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以家族或者宗族为中心，有一套清晰的规则。出了家族和村庄这个熟人社区的范围，就是茫茫如大海一样不可测的陌生人世界。范仲淹在《岳阳楼记》里提到“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表达了精英阶层眼中江湖与正统秩序的距离感。1884年卓子亭《新刻江湖切要》里有一句话：“我家田地江湖，不用耕兮不用锄；说话未完苗已秀，再谈几句便收租。”这句话表达了下层群体对于江湖的反秩序特征的体认。简言之，这个世界不同于现代的社会，没有统一、透明的规则，充斥着你死我活的竞争和对抗，称之为江湖更加合适。正因为此，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里曾经说：“人每责中国人只知有家庭，不知有社会。实则中国人除了家庭，没有社会。”

江湖在历史的变迁过程中积淀为一种文化传统。刘、关、张桃园结义故事，以及梁山“聚义”故事，是这种文化传统的典型案例。这种文化传统的有形载体，则是天地会内部一直在秘密流传的会簿。天地会的会簿版本各异，但内容基本一致，都包括起源神话、入会仪式、会内规章、隐语暗号等部分。这些东西构成了一整套系统的知识，某人一旦拥有（获得），或者掌握（能够解释其中内容），即可用来自行结会，成立组织。之所以说是一种文化传统，是因为它们超越了单一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可以跨越时空环境传播，反复得到“激活”。

江湖传统的表现形式是歃血盟誓，结盟拜会，其深层内涵则是义气。江湖义气与主流文化中的“义”有联系，标榜超越性的“舍生取义”；又有区别，因为与世俗性的“报”相连。最主要的是，江湖义气是特殊主义的，虽然“走遍天下皆兄弟”，但非常讲究等差高下，尤其强调内外之别。

通过“江湖”这一独特的窗口，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到传统中国社

会与文化的深层特征。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对传统中国社会结构有过经典的描绘：“我们的格局……好象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这就是他所说的差序格局。“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人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费孝通这番描绘，是以家族结构为原型的，在社区范围内而言无疑是适用。而若扩展到社区以外的范围，“差序格局”是否依然有效？通过对江湖的观察，尤其是对江湖义气的分析，我们可以放心地说，差序格局对于描述整体意义上的传统中国社会结构而言，也是有效的。

后殖民主义与科学

——科技知识的全球性与地方性

南京大学哲学系 蔡 仲

一、科技知识的“全球性”

美国科学史家巴萨拉(George Basalla)提出的三阶段模型，讨论了西方科学从中心到边缘传播时各个阶段细节：第一阶段里，边缘的探险为欧洲科学提供了原材料与场所；在第二阶段里，欧洲科学在殖民地国家派生出附属机构；第三阶段里，殖民地国家形成了一个西方意义的“民族”科学。上述巴萨拉模型在两种意义上提供了一个从中心到边缘的欧洲科学中心



论的传播模型：一种是地理意义上，表现为从西方欧洲到非西方国家或地区的单向线性传播过程；另一个则是文化和认知意义上，表现为科学是普遍客观的，超越了时空的限制，科学的传播过程是同质化的。美国另外一位科学史家佩尔森(Lewis Pyenson)提出了“文化帝国主义与精确科学”之间关系的理论，认为精确科学与制造科学的场地和情境等无关，它可以被法国、德国和荷兰等欧洲列强国家用来扩张其在海外殖民地的政治、经济、商业和军事利益，它负载着文化帝国主义的文化使命，是帝国主义扩张的文化先锋队。

巴萨拉模型和佩尔森的“文化帝国主义”所传递的主要含义为：西方科技具有客观性和普遍有效性，超越了不同社会文化的限制，科技的传播过程表现为一种欧洲中心论，即是从中心（西方欧洲）到边缘（非西方国家）的一种单向、线性、同质化的“进步”过程。

二、科技知识的地方性

受到库恩哲学和 SSK 对称性思想影响，一种关于跨文化比较研究的后殖民科学观由此诞生并蓬勃发展。它的核心观点为：所有的知识系统，包括西方欧洲科技知识在内，都是平等的，都不过是一种地方性系统(local systems)，根源于其所处的文化和地域等情境。西方科技和其它非西方欧洲地区的科技（如：中国或印度的古代科学或阿赞德人原始部落的信念）一样地位平等，无一优先，都不过是地域文化的建构产物。

后殖民科学观看到了科学和技术的情境性特征，即科技具有社会性和地方性，这对破除科技欧洲中心论的幻觉具有重要意义，但另一方面，后殖民科学观完全颠覆了科技的客观性，过于强调地方性和差异性维度，忽视了全球性维度，这种做法只会造成不同民族科技之间的永久隔阂，走向文化相对主义，陷入到“地方性”海洋的困境中。

三、互动中的发展——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

在科技的全球化传播或地方性生产中，科技与社会、文化是在互动中共同影响，共同发展，即西方在塑造非西方世界时，非西方世界也在重塑西方世界。“全球性”维度与地方性维度辩证缠绕在一起，而这正是后殖民科学观的分析视角。任何地方性科学包含着全球性与地方性两个维度的辩证关系，即在一个全球性语境中如何改造地方性科学的知识、身份和界限，在各种地方性科学之间建立一种杂合型科

学实践网络。在中西医的结合中,这种网络体现在研究人员的杂合构成,还表现在杂合的实验过程中,如将针灸现象、MRI 和神经理论结合起来考虑,权宜性放弃了地方性的文化基础,如中医的阴阳五行理论。这种权宜性放弃的原因主要在于中医与西方生物学在学术权力上的不对称性。但也只有在这种权宜性放弃中,中西医之间才可能产生出实践中的互动与冲撞,才有可能发展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科学,这才是人类的共同财产。

从协调发展到环境优先

——当代中国环境法制的历史转型

南京大学法学院 吴卫星

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是我国环境法的首要原则。事实上,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协调方式有两种:一是在不构成经济增长和开发障碍的前提下去协调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即以经济开发为主兼顾环境;二是以环境保全为中心去协调经济增长和开发,即在优先考虑环境的前提下与经济开发相协调。抽象地看,协调环境与经济和开发并不是问题,但事实上如何协调二者一直就是问题。比如上述两种方式虽都可说是环境与经济和开发相协调,但其旨趣则完全相反。



我国环境法的协调发展原则在实践中没有得到贯彻和落实,经济利益作为强势利益在与环境利益协调的过程中压倒性地胜出,协调的

结果是环境利益总是被忽略、被牺牲。这实际上揭示了一个严峻的现实：中国环境利益、政策与法律的边缘化。我国的协调发展原则背后存在一个认识论的误区：过于强调环境利益与经济利益的统一性，而忽视了两者的利益所存在的矛盾性。可以说，在现实中，两者的矛盾性、对立性更为突出，这时必须要有所取舍，协调发展只是回避这种矛盾，环境优先才是直面矛盾、代表未来环境法发展取向的一个新原则。环境优先是我国环境法律与政策中正在浮现的原则，2005年《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2006年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批准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以及一些地方立法都体现了环境优先原则。

在生态危机日益严峻的背景下，从协调发展到环境优先代表了我国环境法制的历史转型，这个转型正在进行、尚未完成。笔者建议，在修改《环境保护法》时，应当用环境优先取代协调发展的规定，并通过相应的制度保障和增强环境法的实施效果，促进这一历史转型的实现。

环境优先，作为一项正在浮现中的基本原则，其主要内涵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立法优先。将环保法规和规章作为立法规划的重点，依据环境保护需要优先立法，增强地方环保立法的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第二，规划优先。将环保规划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约束性、指导性规划，其他专项规划在编制过程中要主动与环保规划、生态功能区划相衔接。第三，环评优先。将规划环评、建设项目环评作为第一审批环节，建立各类专项规划立项的备案制度，规划和建设项目未通过环评不得实施。第四，投入优先。将环保投入作为公共财政的支出重点，确保财政对环保支出的增幅高于经济增长速度。注重运用市场机制，引导社会资金优先投入环保产业和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第五，考核优先。将主要环保指标作为区域发展绩效和干部考核任用的重要内容和刚性指标。

“肉食者鄙，未能远谋”。这是因为，一般的官僚决策体制是短视的，热衷于追求短期可见的政绩。而环境保护，“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环境利益作为一项长远的利益，往往付出成本大，见效慢。如果没有有效的强制性的制度保障，政府官员的决策常常会亲经济利益，而远环境利益，牺牲长远的环境利益以换取一时的经济发展。环境法

作为一门新兴的部门法,涉及高度的利益冲突,而其核心乃是处理环境利益与经济利益之间的关系。我国的协调发展原则背后存在一个认识论的误区:过于强调环境利益与经济利益的统一性,而忽视了两者作为互相竞争的利益所存在的矛盾性。可以说,在现实中,两者的矛盾性、对立性更为突出,这时必须要有所取舍,协调发展只是回避这种矛盾,环境优先才是直面矛盾、代表未来环境法发展取向的一个新原则。在生态危机日益严峻的背景下,从协调发展到环境优先代表了我国环境法制的历史转型,这个转型正在进行、尚未完成。笔者建议,在修改《环境保护法》时,应当用环境优先取代协调发展的规定,并通过相应的制度保障和增强环境法的实施效果,促进这一历史转型的实现。

中韩企业海外扩张战略动机比较研究

南京大学商学院 戴万稳

中国和韩国均属于东亚新兴经济体国家。韩国企业海外扩张战略的实施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中国企业的海外扩张战略实施相比于韩国企业约晚 10 至 15 年左右,但中国企业的海外扩张发展速度非常快。就两国企业海外投资额而言,1992 年受邓小平南巡讲话和中国政府改革开放进一步加大的政策影响中国首次超过韩国,2001 年受中国加入 WTO 的影响



第二次超过韩国,在 2004 年第三次超过韩国之后便一直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短短二十年时间内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几乎涉足全球

所有的国家和地区。

基于近年来中国和韩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中韩企业海外战略扩张的现状和变化特点:从行业分布来看,中国企业海外扩张战略中商业服务业和金融业所占的比例上升,采矿业和交通运输仓储业所占比例日渐减小,制造业的海外扩张呈现数量较多但规模较小的态势,韩国企业海外扩张战略的重点依次是制造业、批发零售业和采矿业;从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区流向来看,中国企业的海外扩张以亚洲为主,其次便是拉丁美洲和非洲,韩国企业海外扩张战略的重点依次是亚洲、北美洲和欧洲。中韩两国推动企业海外扩张的初始动机均是为了解决各自本土体制环境下的竞争优势问题,然而,中国和韩国企业的竞争优势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也导致了促使其海外扩张的动机和激励因素的不同。

从生产要素方面来看,中国和韩国跨国公司的海外扩张动机显然均在于寻求各自在本土市场所不能得到满足的新的生产要素资源。特别是在韩国,对自然资源要素需求的上升与自然禀赋不足的矛盾迫使韩国企业将目光投注于海外市场,导致了 20 世纪 80 年代初以来韩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稳定而快速的生长。另外,作为对韩国本土劳动力成本上升和韩国货币升值的反应,韩国各大财团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便开始在东南亚设立离岸工厂,将制造和装配活动向印尼、中国和东欧等廉价劳动力地区转移,并投资于高附加值知识密集型产业。相比较而言,生产活动迁移带来的成本降低并非中国企业投资海外的主要动力。中国企业原先在东南亚以及近期在澳大利亚和南非的投资和扩张,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政府出于重要资源短缺的考虑,另外一方面则是中国企业对国内要素市场竞争劣势的一种补偿。

从需求状况要素方面来看,规模有限的本国市场是韩国企业进军国际市场的主要推动力。而相比较而言,中国本土市场规模巨大且地区差异较大,其对中国企业海外扩张战略的影响更为复杂:近三十年来欧美发达国家和其他亚洲国家如日本和韩国的全球性品牌以越来越快的速度进入中国,特别是 2001 年中国加入 WTO 之后,全球五百强跨国公司中的九成以上均已涉足中国市场,这种状况导致中国本土企业不得不基于本土市场与全球一流的跨国公司展开竞争与合作,正是这种竞争与合作使得中国企业在残酷的竞争洗礼中快速成长并获

得和丰富了进而参与全球竞争的能力，产生了海外扩张的动机。

从相关支持产业竞争力要素来看，韩国经济发展的成就主要得益于私营业者的创业并成长为大型企业财团，这些企业财团本质上均是一些相互支持的借助于垂直整合和横向多元化在很短的时间内实现规模经济的企业集群，这种多元化的附属企业群形成了一个在财团核心企业控制下高效运作的内部市场，其与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大型国有企业盛行的“大锅饭”管理体制有着本质的区别。正是这种垂直整合竞争优势，成为了韩国企业实施海外扩张战略主要驱动力之一。相比较而言，中国行业集群内大型企业之间的联系显得极为松散，大型国有企业大多因为政府长期的过度保护而面临着低效率高消耗竞争力较差等问题，其间在海外扩张战略上的驱动力大多源自于中国政府在 21 世纪打造世界级大企业的愿望。

从管理理念和同业竞争要素来看，中国国有企业长期以来因运营效率低下带来的负面影响在某种程度上被来自国有商业银行的优惠信贷和政府的优惠政策所抵消，对经营管理绩效的评估体系不合理，对经营管理者的选拔机制缺位，导致大多数国有企业（尤其是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管理理念落后，管理能力较差，竞争意识淡薄且经营管理知识贫乏，企业运营长期处于低效率高消耗状态，海外扩张规划的制定依据是政府高层的意愿和政策引导而不是对商业价值的评估，因此，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许多企业的海外扩张战略规划所关注的指标一般都是市场份额、新创造的就业机会等等，而很少关注利润要素。相比较而言，韩国企业在全球市场上一直秉持自身的财团体系特色管理，在企业内部推行一致的管理技能标准并进行有效的协调和整合，坚持发展自身的技术和品牌，并在东欧和中亚地区成功获得了一定的市场份额。

从政府政策要素来看，在中国加入 WTO 之后，政府为了应对新的全球性挑战和满足国内经济发展的需求，就引进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均制定了一系列战略性框架。而韩国政府的角色也是类似的，在积极加入 WTO 和 OECD 等国际组织之余，通过立法的形式不断提升其整体经济的自由度，全力为跨国公司打造宽松的海外扩张环境。在韩国跨国公司的海外扩张过程中，政府既是保险家又是金融家，透过政府控制的商业银行为财团提供政策性贷款。简而言之，政府的政

策环境有效的促进了中国和韩国跨国公司的海外扩张。

从市场机会要素来看,近年来人民币所面临的政策性升值压力越来越大,可以预见的是,尽管中国本土市场规模的庞大使得中国企业面对诸如全球性或区域性金融危机这样的外因变化具有较好的抗压能力,但这种压力势必导致中国企业会进一步通过跨国并购加速海外扩张的步伐以拓展生存空间,获取可持续发展所需的自然资源,摆脱中国制造的不良品牌印象,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先进的市场分销网络和研发合作体系。而韩国企业的海外扩展进程将有所不同,因为其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推动力主要在于降低成本和市场渗透。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因为韩元的升值导致在海外直接生产要远比在韩国生产后再出口有利可图,韩国的许多服装、鞋类、玩具制造等劳动密集型企业便纷纷向海外转移和扩张。一个国家的科技创新体系和能力对跨国公司海外扩张动机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中国长期以来在科技创新领域存在着严重的理论与实践创新脱节问题,许多高科技成果在生产转化中因为管理体制的局限性而难以实施,而韩国的产学研体系结合则相对比较紧密,科研成果与市场机会的对接极大的提升了韩国跨国公司海外扩张的能力。

虽然跨国公司可能会因为本土市场上一个或几个要素的短缺刺激和促进其海外扩张的动机和行为,但具体的海外扩张动机因素又会因各国本土市场要素结构的不同以及政府政策和市场机会的差异而彼此大相径庭。就中韩跨国公司的海外扩张战略而言,相似点在于其均与本土市场上自然资源的短缺、打造其全球品牌形象以及政府制定的产业政策相关,不同点在于韩国企业海外扩张的动机中更富有降低成本和市场渗透的诉求,而中国企业考虑更多的则是市场规模、市场占有率等因素。

会议综述

“汉学主义：理论探索”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0年10月20日至21日，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主办了主题为“汉学主义：理论探索”的学术研讨会。此次会议邀请了包括美国德克萨斯州立大学、香港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

国社会科学院、四川大学等高校在内的众多知名学者与南京大学的学者一起,就“汉学”、“国学”、“中国学”、“汉学主义”、“东方主义”等当前学术界和思想界的热点问题发表看法,进行思想交锋。

本次会议特别邀请美国达拉斯德州大学中国文学与比较文学教授顾明栋做主题发言。顾明栋教授的发言阐述了汉学主义与萨义德的东方主义之间的关系。他特别强调虽然两者之间存在某些相似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汉学主义只是东方主义的缩小版或者说部分的应用。因为萨义德的所谓东方主义指向的是西方的读者,是一种学科批判,对其理论研究的方法、范式、价值取向和目的诸方面潜在的意识形态的偏见予以揭露。

与东方主义不同,汉学主义的诊断所指向的不仅包括西方的汉学家,华裔学者,还特别地包括中国学人,他们无批判地将西方的视角内在化,集体无意识地把西方的前提预设当然化,进行知识的生产而忽视了其隐性的体系。汉学主义便是这样的一种关于中国的知识生产方式,也是一种心态。他特别要求警惕由认识论的惰性导致的思想观念的殖民化,同时提出将汉学主义蕴含的积极性的建设性范式转换的潜在在批判的基础上得以挥发的可能性。

针对顾明栋教授在主题发言所提出的问题,清华大学王宁教授、人民大学耿幼壮教授、社科院赵稀方研究员、叶隼研究员、四川大学曹顺庆教授、赵毅衡教授,以及南京大学程爱民教授、张伯伟教授、程章灿教授、钱林森教授等学者先后发言阐述自己的见解,《学术月刊》主编田卫平教授与何成洲教授的点评画龙点睛,让讨论更加热烈深入。

王宁教授认为,自从萨义德对东方主义进行建构性批判以来,东方主义就成了研究后殖民主义的一个逻辑性点。作为后殖民研究的奠基性著作,他的《东方主义》不仅对国际东方研究有着广泛的影响,同时也对国际中国研究有着深刻的影响。根据萨义德对东方主义的建构,这一术语有三层意义:东西方的文化关系,西方的东方研究学科,以及西方表现系统中对东方形象的再现。我们若将其用于西方的中国研究,也许可以做出相类似的建构:长期以来的中西文化关系,西方的中国研究学科,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以及西方媒体对中国的再现。但与西方的东方主义或东方学所不同的是,近几年来,随着中国第三世界身份的被质疑以及中国综合国力的日益强大,这种汉学主义又发

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一方面是对中国“威胁”的恐惧,另一方面则是不恰当地要中国担负发达大国的责任。所有这些都是当代汉学主义的虚伪性和谬误。真正的中国究竟是何种形象?这也许正是我们所要探讨的。在把东方主义用于中国研究时,要将其“语境化”,即要根据中国这个曾经的古老帝国、后来又沦落为一个三流大国的现实作出不同于东方主义的建构。因此汉学主义的建构是颇有必要的,对它的批判性研究也应该是国际东方研究的一个重要而独具特色的部分。

叶隽研究员从汉学主义入手,讨论其学术话语背后的权力制约因素,并进而影响到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我殖民潜意识。他提出“求真之学”乃是一个以学术为志业者的基本品格,也是事物原相的有机二元组成之一。我们一方面应直面西学全球化的后果,注意汲取西学中具有普世价值的那部分精华;另一方面应努力建构属于自身的东方现代性。总体而言,就思想导向来说,西学不具备领头羊的意义;而在具体的范式建构、制度确立等方面,包括形而下的器物争雄领域,西学具有相当启迪乃至主导性意义。所以西学全球化、汉学主义、权演论这几个概念是三位一体、彼此关联的。作为学人,我们应在坚守“求真之学”的基础上努力探寻“求智原则”,既要考察以亚洲文化为主体的东学生成,凸显与西学互补的东学价值,更要关注“求智原则”可能促成的“东西二元互补结构”的现代性概念的重建问题。

曹顺庆教授提出,汉学主义是与汉学相关联的一个概念,它反映了西方对于中国研究的一种知识范型与学科体制的建构,这一过程难以避免受到西方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的影响。汉学主义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正是在一种“西方中心论”操控下的产物。在全球化语境下,西方强势话语占据主导权,中国知识形态的现代化演变为一种全面西方化的趋势,传统、历史、现实之间被割裂,而比较文学的“失语症”正是盲目向西方趋同的一个重要表现。针对汉学主义产生的相关问题,“变异学”作为一种以异质性和变异性为基础的方法论和认识论,强调在一种交互、混生的状态下在异质文化之间形成一种自然合理的文化调节机制,从而实现一种真正的内在平等。同时,在国际化语境中,文化主体应不断反思和调整自身与外界的关系,努力构建一种积极而真实的中国形象,并将中国文化的独特精神和内在活力带向整个世界。

赵毅衡教授则从“批评理论”的角度展开论述。他认为,近十多年

来,文学理论、文化理论正在汇合成一个具有相当普适性的“批评理论”,而且这个批评理论正在成为“世界批评理论”。批评理论有四个支柱:马克思主义,现象学/阐释学,精神分析和形式论。其余的各种理论(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性别研究)可视为其延伸。只要我们回到四个支柱理论,我就不会永远陷于“不是跟着说,就是自言自语”的两难之境,不会以西方“新出”学说为学术时尚疲于奔命,要不就是固守十九世纪之前的本土思想材料,抵制“西方的”批评语言。事实证明,中国学者能够对建立一个普适性的批评理论做出贡献。

香港大学雷金庆教授则系统梳理了“汉学”、“国学”、“中国学”等概念。他指出,第二世界大战以前,国学和汉学(Sinology)一起造成汉学主义意识形态。当时汉学主义大多显于人文学科,五六十年代后区域学(Area Studies)兴起,社会科学对中国重视,汉学也很快变成中国研究(China Studies)。但区域学没有摆脱汉学主义意识形态,社会科学研究中国也不完全科学。自九十年代起,中国国际影响甚大,加上在国外(回归)华人学者影响力大大增加,有一种倾向就是反汉学主义(Anti-Sinologism)意识形态。但反汉学主义不是说反对汉学主义(Criticize Sinologism),而是把汉学主义翻过来(Reverse Sinologism)。这种新的意识形态照旧进行中西比较,不过说中国文化比别的都好罢了。我们需要一个新的跨区域跨学门的 中国研究方针,叫它什么名字不是问题,问题还是怎样打开我们一切以中国为主题、中国人为主角观点的心态做学问?以前国学大多指中国人研究旧中国文化,汉学即非汉族外国人研究旧中国文化。现在研究中国文化大致以不分种族国籍学派,中外学者都有责任保持这个好现象。

此外,人民大学耿幼壮教授通过对谢阁兰(Victor Segalen)与跨文化交流中的异邦想象问题,福柯(Michel Foucault)与思想与存在的历史先验性问题,以及费诺罗萨(Ernest Fenollosa)和庞德(Ezra Pound)诗学思想的历史地位问题的分析阐述他的观念。社科院赵稀方研究员则系统分析了汉学主义与东方主义的内在联系,指出一种理论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所起的作用是完全不同的。在西方语境中,东方主义是一种站在边缘立场批判西方主流文化的理论,显示出文化批判的意义,但对于西方文化主流的批判到了中国的语境中,却产生了完全

不同的意义,因此我们需要批判的分析。

汉学主义是一个涉及中国知识生产的新概念,它既是一套知识体系,又是一种实践性理论。在世界一体化进程不断加速的今天,我们将以什么样的心态面对世界、看待自身,这是一个有着强烈现实意义的理论问题。本次会议并未就相关问题达成某种结论,但是通过学者们的交锋和讨论,却将汉学主义及其相关问题的思考凸显了出来,从而提出了问题,提供了某种思考的端点。本次会议将对此问题的研究引向深入。

跨学科研究

南京大学—哥廷根大学德语精英班项目



南京大学高研院的跨学科研究层次鲜明,丰富多彩。除了面向知名学者的教授沙龙,面向教师的学术沙龙,面向青年教师的青年教师沙龙、面向学生的跨学科选修课之外,还大力倡导学生间的跨学科交流活动。其中,面向南京大学本科学生的“南京大大学—哥廷根大学德语精英班”项目便是其中的一项。

继 2008 年成功举办了首届南京大学精英法语班之后,以此为参照,根据南京大学与德国哥廷根大学 2009 年 10 月签订的合作协议,由哥廷根大学与南京大学合作举办的德语精英班于 2010 年 9 月开办。该班从属于南京大学,由南京大学研究生院、南京大学教务处和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共同负责招生工作。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和哥廷根大学南京代表处具体承办。

德语精英班是南京大学“三三制”本科教学改革和人才培养国际化战略中的一项重要举措,旨在培养一批人文与社会学科高层次、国际化的未来精英人才。精英班学员将通过课堂学习德语,并通过赴德交流和深造了解哥廷根大学的教学方式,了解当前德国在人文与社会科学相关领域的前沿动态,并为能够熟练运用德语进行跨文化交流和国际学术讨论与研究打下坚实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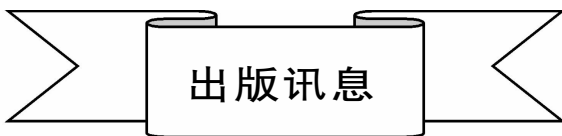
该项目以语言学习、教学、评估共同参考框架为标准,由德国哥廷根大学全程介入,指派专业的德籍精英教师团队任教,并提供丰富的交流学习机会,每年有 1 至 2 次 DAAD 全额奖学金交流活动。语言教学依托跨文化背景,使用多语言授课(中、英、德),结业学生德语水平将达到德国大学研究生入学水平(德福 DSH 三级)。课程内容紧密联系大学生活,着眼于未来从事科学研究,采用现代教学方法:以学生为中心,促进自主学习,师生合作式、情境式、启发式教学。此外,精英班的培养模式采取贯穿本、硕、博的贯通式培养,链接了本科四年级和硕士研究生一年级两个培养阶段,在精英班结业后的博士研究生培养阶段中,部分学员还将有机会赴哥廷根大学交流深造。

在为期 4 个学期共 2 个学年的培训中,学生将接受德语的强化训练,参与德国著名专家学者担纲的各类学术讲座。德语教学由哥廷根大学协助招聘的德籍外教主讲。课时安排原则上为每周 15 课时,每学年总计约 510 课时,两学年共计约 1020 课时。

两学年中另将安排约 15 次德语专题学术讲座,目的是使学生能大致了解德国及欧洲的现状 & 德国现行的学术研究方法。南京大学相关专业的教师也将在培训班开设与德国文化相关的专题讲座。学习结束后,经考核合格,学员将获得由南京大学和哥廷根大学共同颁发的德语精英班结业证书。

2010 年 9 月 17 日,德语精英班举行开学典礼,首批学员共 23 人

参加培训,他们分别来自南京大学的中文、历史、哲学、社会学、新闻传播学、政府管理、商学、法学以及文科强化部等多个学科和专业。在学习语言和文化的过程中,他们通过彼此间的接触和交流,也增加了不同学科领域和专业之间的对话,为今后的从事科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更高的起点和更宽的视角。



《文化研究》第十辑



主编 周 宪 陶东风
主办 首都师范大学
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
出版 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

《文化研究》第十辑是一个关于空间问题专题研究的特辑。

近些年来，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以及工程和自然科学领域，空间作为一个热门话题引发了许多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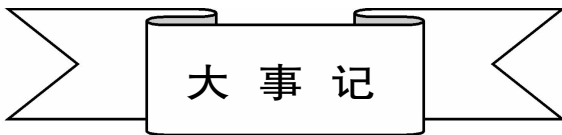
术论证，催生了不少新的学派、观念、方法和理论。毋庸置疑，空间问题正在成为一个跨学科研究领域，新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以至于出现了一个很响亮的口号“空间的转向”(“the spatial turn”)。2009年英国罗德里齐出版公司出版了一本颇有影响的论集《空间的转向——

跨学科视野》，邀请了欧美空间研究的知名学者撰文，其讨论的问题从如何看待空间，到空间运动，到网络化和全球空间，从殖民地到文化生产，从地图学到性别问题，涉及人文社会科学的诸多领域。该书主编在导论中说得好：“空间并不仅仅是社会和文化趋向的被动反映，它同时也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跨越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空间研究已是不可避免的，这么来看，空间的转向是不可逆转的。”确乎如此，只要我们对当今中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献稍加检阅，便会发现空间作为显学已经走到了学术舞台的前沿。随着中国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城市化甚至乡村的空间问题再一次凸显在我们面前。

本期《文化研究》聚焦于空间问题的研究，是南京大学来自不同学科学者所组成的“中国城市化空间生产”团队的研究成果。这些学者分别来自建筑学院、城市规划系、地理系、哲学系、历史系、社会学系、文学院、思想家中心、新闻传播学院等。虽然大家的学术背景差别悬殊，但是对于同一个问题——空间——的兴趣是共同的。有感于中国在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诸多复杂的空间问题，有感于这些问题无法在一个学科内部得到圆满解决的事实，有感于国内学科壁垒森严、障碍林立的现状，大伙儿坐在一起讨论、切磋、争论和商议，于是形成了这批跨学科或多学科的空间研究论述。

本期对空间问题的讨论集中在以下五个主题上：第一个主题是作为一个核心概念的空间问题；第二个是现代性和历史记忆的权力空间；第三个是当代中国的空间问题；第四个是城市建筑的空间问题；最后一个主题更加经验性，亦即速度对空间的影响，可以概括为“空间的速度政治”。

从根本上说，文化研究的本性就是跨学科的，或者说文化研究乃是超学科的。就像今天的学科分类无法涵盖文化研究一样，没有边界就是文化研究的特点。而空间问题之所以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化研究课题，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身处一个具体的物质的、精神的、历史的和社会文化的空间之中。就像鲁迅所说的那样，人无法通过拔起自己的头发而离开地面一样，我们总是身处特定空间里，于是，空间就永远是我们不得不反复考量的重要问题。



高研院 2010—2011 学年第一学期大事记

(2010 年 9 月 1 日—12 月 27 日)

9 月 1 日,高研院聘任陈蕴茜、黄荭、李里峰、胡恒为高研院兼职研究员。

9 月 17 日,首届“南京大学—哥廷根大学精英德语班”开学典礼。

9 月 23 日至 25 日,高研院与日本人间文化研究机构共同举办“中日视野下的东亚知识体系构建”国际学术研讨会。

10 月 7 日至 9 日,德国哥廷根大学现代德语文学和比较文学教授 Heinrich Detering 访问高研院,并应邀作主题为“Thomas Mann and Bertolt Brecht: Two Apostates of Buddhism?”的演讲。

10 月 10 日至 12 日,美国纽约大学表演研究系知名学者 Richard Schechner 教授访问高研院,并做主题为“9/11 As Avantgarde Art?”的精彩演讲。

10 月 12 日至 14 日,德国哥廷根大学副校长 Hiltraud Casper-Hehne 教授访问高研院,受聘为“高研院特聘访问教授”,并做主题为“Doubt grows with knowledge-Intercultural Interaction: Problems

and Perspectives”学术演讲。

10月20日至21日,高研院举办“汉学主义:理论探索”的学术研讨会。

10月20日至24日,德国柏林自由大学 Erika Fischer-Lichte 教授访问高研院,并做主题为“Finding and Forging an Other Theatre On the reception of Chinese theatre in Europe”演讲。

10月15日,高研院特聘教授、美国达拉斯德州大学中国文学和比较文学教授顾明栋来院工作,并于10月22日做主题为“汉学、汉学主义与东方主义”演讲。

10月28日至30日,著名的新左派思想家、海德格尔研究专家、美国纽约市立大学 Richard Wolin 教授访问高研院,并做主题为“The Wind from the East: French Intellectuals, May'68,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演讲。

10月30日,德国哥廷根大学美国研究项目主任 Frank Kelleter 教授访问高研院,并分别做主题为“文化研究与美国电视”和“文学和电影改编—《绿野仙踪》与美国流行文化”演讲。

11月1日至12月1日,徐兴无教授赴台湾大学高研院做为期一个月的短期访学,他是南大高研院派出的第八位赴台大高研院短期访学的学者。

11月8日至10日,美国布朗大学副校长 Matthew Gutmann 教授应邀访问高研院,并做主题为“认识战争:伊拉克战争美国老兵中的男性气质的分歧”的首场“南京-布朗论坛”的演讲。

11月5日至9日,高研院组织南京大学相关院系学者12人参加由台湾中央大学举办的第五届“两岸三地人文社会科学论坛”,主题为“绿色启动:重探人与自然的关系”。

11月16日,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黄承元教授访问高研院,并做主题为“跨文化戏剧与全球化”演讲。

11月19日,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周启荣教授访问高研院,并做主题为“明清城市的士商、碑刻与公共文化:公共领域中的纷争、法律与地方秩序”演讲。

11月23日至12月6日,高研院举办“如何撰写欧美大学文科博士、博士后奖学金的申请报告”的学术工作坊。

11月25日,高研院驻院学者、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高传胜副教授做主题为“如何让发展更加包容起来?——基于中国现实的思考”的学术前沿演讲。

11月30日,挪威奥斯陆大学文化研究与东方语言系 Rune Svarverud 教授做主题为“The creation of a Chinese language for the modern sciences: International law and chemistry as cases”演讲。

12月1日,高研院聘任历史系陈蕴茜教授为高研院院长助理。

12月2日,高研院驻院学者、南京大学历史系李恭忠副教授做主题为“江湖:中国文化的另类解读”的学术前沿演讲。

12月6日,以色列希伯来大学高等研究院院长 Eliezer Rabinovici 教授应邀访问高研院。

12月9日,高研院驻院学者、南京大学哲学系蔡仲教授做主题为“后殖民主义与科学”的学术前沿演讲。

12月13日,高研院驻院学者、南京大学商学院戴万稳副教授做主题为“组织学习:危机管理之道”的学术前沿演讲。

12月16日,何成洲教授当选“国际易卜生委员会”主席,这是第一次由亚洲学者担任该会主席。

12月16日,高研院驻院学者、南京大学法学院吴卫星副教授做主题为“从协调发展到环境优先——当代中国环境法制的历史转型”的学术前沿演讲。

12月19日至22日,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教授、哈佛大学博士、教育部“长江学者讲座教授”尹晓煌访问高研院,并做主题为“全球化与华人跨国民族主义:兼论美国人文与社会科学发展新趋势”演讲。

12月20日至2011年1月20日,高研院驻院学者李恭忠副教授赴台湾大学高研院做为期一个月的短期访学。

12月22日,高研院名誉院长、江苏省政协主席张连珍女士在南京大学做主题为“坎离两卦研读”的专题报告。

12月27日,高研院举办主题为“概念与记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新动向”的学术沙龙。



Major Events

IAS 2010—2011 Fall semester major events

(September 1 to December 27, 2010)

September 1, IAS appointed Chen Yunqian, Huang Hong, Li Lifeng, and Hu Heng as part-time research scholars.

September 17, first “Nanjing University/ Georg-August University of Goettingen English German Class” opening ceremony.

September 23 to 25, IAS and Japanese National Institute for the Humanities co-sponsored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seminar “Chinese and Japanese Perspectives of Eastern Asia Intellectual Structure.”

October 7 to 9, German Georg-August University of Goettingen’s professor of modern German literature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Heinrich Detering came to visit IAS and delivered a lecture titled “Thomas Mann and Bertolt Brecht: Two Apostates of Buddhism?”

October 10 to 12, well known New York University Perform-

ance Studies professor Richard Schechner came to visit IAS, topic of his lecture was “9/11 As Avant-garde Art?”

October 12 to 14, Georg-August University of Goettingen vice-president, professor Hiltraud Casper-Hehne visited IAS. He was appointed as “IAS distinguished visiting research professor,” he also gave an academic lecture titled “Doubt Grows with Knowledge- Intercultural Interaction: Problems and Perspectives.”

October 20 to 21, IAS hosted “Explore the Theory of Sinology” seminar.

October 20 to 24, German Free University of Berlin’s professor Erika Fischer-Lichte visited IAS, also lectured on “Finding and Forging Another Theater On the Reception of Chinese Theatre in Europe.”

October 15, IAS distinguished research professor, University of Texas at Dallas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professor Gu Mingdong came to work, and on the 22nd of October lectured on “Chinese Literature, Sinology and Orientalism.”

October 28 to 30, well known new left thinker, Heidegger Studies expert,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ofessor Richard Wolin visited IAS. Gave a lecture on “The Wind from the East: French Intellectuals, May’68,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

October 30, Georg-August University of Goettingen American Studies director, professor Frank Kelleter came for a visit. The professor gave two lectures, one on “Culture and American Television” and another on “Literature and Movie Adaptations-Wizard of Oz and American Pop-culture.”

November 1 to December 1, professor Xu Xingwu went to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s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for a month as a visiting scholar, he was Nanjing University’s 8th appointed professor as visiting scholar to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November 8 to 10, Brown University’s vice-president professor Mathew Gutmann was invited to IAS, he lectured on his book

“Breaking Ranks: Iraq Veterans Speak Out against the War” and opened the “Nanjing-Brown Forum.”

November 5 to 9, IAS sponsored 12 Nanjing University scholars to attend the fifth “China and Taiwa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Forum” hosted by Taiwan’s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The main topic was “Green Initi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November 16,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s professor Huang Chengyuan visited IAS and delivered a lecture on “Intercultural Theater and Globalization.”

November 19, University of Illinois’s professor Zhou Qirong visited IAS, lecture topic was “明清城市的士商、Inscription and Public Culture: Dispute within Public District, Law and Local Order.”

November 23 to December 6, IAS hosted a workshop on how to write doctoral and post-doctoral humanities study scholarship applications for western university.

November 25, IAS resident research scholar, Nanjing University School of Government associate professor, Gao Chuansheng, lectured on “How to Make Development More Tolerable? – On the Basis of Chinese Realistic Thinking.”

November 30, Norway’s University of Oslo’s Department of Culture Studies and Oriental Languages professor Rune Svarverud lectured on “The Creation of a Chinese Language for the Modern Sciences; International Law and Chemistry as Cases.”

December 1, IAS hires Department of History’s professor Chen Yunqian as the assistant of the Dean of IAS.

December 2, IAS resident research scholar, Nanjing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History associate professor Li Gongzhong lectured on “Jiang Hu: The Alternative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December 6, Hebrew University of Jerusalem’s dean of the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professor Eliezer Rabinovici was invited to visit IAS.

December 9, IAS resident research scholar, Nanjing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professor Cai Zhong lectured on “Post-colonialism and Science.”

December 13, IAS resident research scholar, Nanjing University School of Business associate professor Dai Wanwen lectured on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The Way of Crisis Management.”

December 16, professor He Chengzhou was elected presid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Ibsen Committee, professor He is the first Asian scholar to be elected as president.

December 16, IAS resident research scholar, Nanjing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 associate professor Wu Weixing lectured on “From Coordination Development to Environmental Priority: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 of Environmental Law of China.”

December 19 to 22,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ofessor, Harvard University Ph. D. graduate, Ministry of Education “Cheung Kong Scholar” lecture professor Yin Xiaohuang visited IAS. Professor Yin’s lecture topic was “Globalization and Transnational Chinese Nationalism: an Overview of United States New Trends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December 20 to January 20 of 2011, IAS resident research scholar, associate professor Li Gongzhong went to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s Institute of Advanced Studies for a short one month academic visit.

December 22, IAS emeritus president, Jiangsu province political consultative Mrs. Zhang Lianzhen visited Nanjing University and gave a special topic lecture on “Antithesis 两卦 research.”

December 27, IAS held an academic salon titled “Concept and Memory: New trends of Chines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主办单位：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

本期编辑：陈 勇 校 对：樊 颖

出版日期：2011 年 4 月 25 日

编辑地址：南京大学逸夫馆 9 楼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邮编 210093)

电 话：025 - 83593169 传 真：025 - 83592948

电子邮箱：ias@nju.edu.cn 网 页：<http://ias.nju.edu.cn>